

巴山夜雨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 15 期 2012 年 4 月 30 日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纪录片文本）◆谢贻卉	2
天地有正气◆何蜀	13
当年罪名——解读当年开除孙铭勋党籍的组织决定◆孙丹年	15
反右派运动是一个反动事件◆高越农	21
政治话语空间左右概念的颠倒◆周伦佐	22
忆刘光◆高越农	27
渴望吃肉的日子◆陈仁德	30
周福良和他的上海妻子◆陈懋智	31
三个没有“改正”的右派大学生◆陶渭熊	33
我所认识的几个“右派分子”◆何青山	35
迟到的吊唁——重返长寿湖◆它山	37

《巴山夜雨》电子邮箱：bsyy1957@Yahoo.cn

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

(纪录片文本)

谢贻卉

黑夜。列车隆隆驶过原野。

推出片名：

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

车窗灯光一掠而过。汽笛长鸣，车轮铿锵……

夜色中，列车驶近一灯火通明的小站。

灯光站名特写：“隆昌站”。

这是四川省南部的一个县城。本片主人公就生活在这里。

汽笛和车轮声中，一双手展示一叠旧稿纸。

镜头拉开——老人站在铁道线旁，手拿旧稿纸在向记者讲述：

我叫李盛照。这是我 1961 年 7 月写的《饥饿集》。

汽笛长鸣。车轮铿锵……

白天。隆昌站。一辆机车驶近站台。

地图特写。成都到隆昌距离 257 公里。

老人手提大包小包走过县城街道。

喧闹的街边市场。

光线昏暗的屋里，李盛照在翻检旧稿：我看找得到一份完整的不，我看……

老眼昏花的老人用放大镜看旧稿。

音乐声起。

志愿军在行进。

炮火……硝烟……战壕旁志愿军发起冲锋……美军士兵投降……一队美军俘虏被押着走来……彭德怀签署停战协定。

字幕：

1955 年 从志愿军到大学生

志愿军在行进……路边的宣传鼓动……士兵在住地看国内来信和寄来的毛主席像……响起画外音，随后转为老人向记者讲述：

因为我参加过韩战，当时职务是侦察科的见习员。我在回国以后，由志愿军政治部委托辽西军区组织的入朝人员政治审查。那时候一年多，也要学习。我就托人买了本政治经济学——当时政治经济学有好多版本，十二分册，讲苏联社会主义怎么优越，老百姓生活怎么好。哎，当时多感兴趣的吧，简直是天堂。所以报考川大就报考政治经济学。我最反

感的就是统购统销，因为我从五五年回到家以后，当时农民粮食相当紧张。当时侦察参谋条例说，侦察员要做独立工作，把情况做调查，给上级写报告。当时就有概念，而且我从部队回家考上川大，我学经济的，所以对经济、对农业生产状况就很感兴趣，所以当时就做了粮食情况调查。曾经被《四川日报》的《情况通报》内部刊物采用过，就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养成了做调查、反映群众生活生产状况的习惯。

老人从屋里走出又走进。

记者：你担心啥子呢？

李盛照：我担心他们随时抄我的家。曾经托一个可靠的朋友帮我保管。最近才把它要回来。

音乐起……当年声讨“右派”的镜头……

字幕：

1957年 从学生到右派

镜头从复印资料拉开，老人讲述：

查四川大学的校刊，57年7月9号，228期。我从苏联的政治史、经济史、政法史来批判斯大林，我证明他是历史上的反动人物。我觉得我是独立思考出来的，而且作为学术报告——《斯大林历史反动作用初探》的学术报告，这是一个世界共产主义重大的课题。我当时是二年级的学生，全校批斗，大字报。你可能进过川大，看得到，荷花池边上，一直到大学门口，都是批判我的大字报。到了58年3月，处分下来：保留学籍，劳动考察。送到德昌县。我们去的时候，58年3月修河渠，修灌溉渠。到了以后，大炼钢铁兴起，就把我们这些川大的右派学生，大概四十来个，去炼铁，最初修小高炉，小高炉完全是儿戏。

3

音乐起……大跃进年代大炼钢铁等镜头……

字幕：

1961年 从右派到农民

隆昌火车站。铁轨旁。

成都到重庆地图上“隆昌”特写。

李盛照讲述：

我被川大踢出校门，61年押送回家。一下火车，看见路边的死人……

列车隆隆驶过……

李盛照读旧稿标题：《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副标题：《成渝线饥饿死亡调查》。

记者：你写这个调查和信的时候，当时的处境是啥子样子的呢？

李盛照：我当时处境完全是农民。

李盛照读原稿：

最近两年，四川很多地区的死亡数高得惊人。以下是一些例子：隆昌汽车站，4月13日，发现路尸。4月14日，在塔山坡瓦厂路边，也发现路毙。死亡原因90%是水肿病。农民是这样描绘死前情形的：病人喊心慌，气喘不已，要东西吃，正行走间，就倒地死去。人们在睡觉时，似乎并无严重病态，而天明死在床上硬梆梆的。在死者当中，青壮年比重

极大。形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征购，征购是从测产数来确定的，而测产数字由于浮夸欺骗，以至比实际数高一倍或者还要多。因而扫仓也完不成任务。纵然完成了任务，公共食堂也就断炊了。这点做得最彻底的地区，也就是死人最多的地区。荣昌安富镇五富乡六大队，由二百七十人减至二百一十人。王海泉一家三口死绝了。现存的盗窃风是生根于饥饿，而这在很多地区完全是人为的，或者是人为因素加深了自然灾害。割掉农民私有尾巴理论的发明者、执行者，假如他们是诚实的人的话，该受到良心谴责，而要他们对所造成的恶果负法律责任，那只有等待党代会的召开。李盛照 1961 年 5 月 15 日，于四川隆昌乐只乡。

在手稿上叠现字幕：

在农村 李盛照撰写诗歌 收集大饥荒民谣
汇集成《饥饿集》并将它们和饥饿死亡调查
一起向外界寄出

李盛照讲述：

民谣是 61 年收集的——

李盛照读旧稿中当年收集的民谣：

大干部大偷 小干部小偷
水肿病要死完 土地要还原 二天吃都吃不完
肥干部，瘦社员 不肥不瘦炊事员
毛主席哪天垮台 毛主席是来收生的
——陈清和

李盛照：陈清和这个人死了。……或者说看到你家里头冒烟，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做“烟囱长尾巴”，一烧火必然烟囱就要冒烟，就把锅给你砸了。

李盛照读民谣：

《卖儿》
付家公社曾吉昌
家住泡桐树 自幼织麻布
全家人七口 二斤粮不足
争食一口羹 兄妹骂双亲
多食“仙米粑” 儿女皮包骨
(注：“仙米粑”即白泥巴，也叫观音土)
眼看要短命 爹妈割心愁
去年葬父卖幼儿 今天逃生四郎送

记者：你除了把这个东西寄给各大报社，寄给了邓子恢……

李盛照：寄给了马寅初，寄给了郭沫若，大概好像寄给了毛泽东，寄给了邓小平……

记者：郭沫若没有给你回信？

李盛照：没有给我回信。但是直接转给省委了。

李盛照读旧稿：

郭老：

现在我把所发现的严重死亡情况向您报告。假如我的报告被认为是污蔑抹黑现实，那我将忍受由此而带来的恶果，而且绝不抱怨。我毫不羞耻地承认，我是吮吮时代的乳汁长大的，将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时代精神。郭老，您自称为蔡文姬，而我却愿意效法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描述的那个米歇尔·海姆·鲍罗廷，纵然被消灭了，那也死而无怨了。当然我希望有比他更好的命运，因为有了二十大精神的存在……

音乐声中特写：红旗杂志社（1961年6月10日）、《学术月刊》分别给李盛照的退稿处理信。

李盛照在沉思中吸烟……

李盛照戴上老花镜继续读旧稿：

长期饥饿和大量死亡，使老百姓情绪恶劣，而且愤慨，发出了“饿死不如造死”的呼声。教条主义的维护者和饱食者也许会认为这是反动，是受人唆使。假如这样的天良泯灭者掌握了国家民族命运，那将是危险的，会造成更悲惨的恶果。饥饿分布是广阔的，因此，我沉痛而肝胆俱裂地向全党、党中央及一切头脑清醒的人和健康力量呼吁：以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为重，不顾甚至违犯任何权威（哪怕他曾有过真正贡献）的意志，而立即行动起来，召开九次党代表大会，从政治、组织、思想上清算教条主义，查明造成的全部恶果，追究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开除出党，交法庭审判，重新审查并制定全面的农产品征购政策，彻底改变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农产品征购实践，允许个人开荒，利用空闲土地扩大自留地。时机紧迫，如再延迟就有可能耽误国家大计，为民族命运带来巨大灾难。那时就悔之晚矣。李盛照于四川隆昌乐只乡

5

去乐只乡公交车上。

售票员：把票拿好。三个……

年轻售票员向记者讲述：

我们爸爸六姊妹，那些都饿死了，就是我爸爸拿给我叔公带大的。有个姑姑才……呵呵，有个姑姑还没死，还有点子气，就拿给他们去埋嘎了。饿死的。以前是八个人，就饿死了七个，七个都遭饿死了，就剩我爸爸一个人。饿死七个啊！

李盛照在讲述：

我那些材料转回来了，转到隆昌公安局了。公安局还专门派人到乡头来调查，为驳斥我的“反革命谬论”，你看他们工作做到这种程度……

农舍。犬吠声。

李盛照带记者走近一农家。

叠印字幕：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云顶乡村民

陈自林

陈自林：你咋舍得这时候上来？

李盛照：专门来拜访你。

陈自林将来客请进门。

李盛照转对记者：这是当时的生产队队长，老队长了。几十年的老队长，六十年的老队长。

陈自林：坐那里。

李盛照：要得，哪里都要得。61年……

陈自林：因为你哟，公安局来找我少多！

李盛照：是的。

陈自林：在公社，公安局来找过，在屋头也来找过。你写的信，起码是寸多两寸厚。到处交。写给省委书记……

李盛照：李井泉。

陈自林：哦，嘿嘿……派公安局来复查。

李盛照：那会儿你咋个说的？

陈自林：至于我，只有跟他说明，哪些写的，哪些谈的，李盛照写了的，我说，完全是老百姓所谈的。我说，他想得到那么多啊？他听到人家摆龙门阵，一摆他就写。就那样子答复公安局。你回忆，你都还在嘛，那饿死的林子银，两口子都是饿死的。

李盛照：林子银、林子章……

陈自林：那阵硬是没吃的。吃啥子呢？我干了十多年，从59年当的队长。全大队的队长都死完了。只剩我一个了。真正的呀！十多个队长……

李盛照带记者走在乡村小路上。

来到一处老屋前。

李盛照：这里曾经是我住过的家。因为我家地主成分，所以地主扫地出门以后，就搬到这里来。我55年从部队复员回家，也曾经在这儿短期内住过一段时间。55年我考进四川大学以后，57年成为右派，61年押解回乡，也就押到这里。当时我们家里是七口人，我已经三十一岁了，我的弟弟才十岁，还有三个妹妹。七口人就住在这间房子。《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成渝线的饥饿死亡调查报告》就是在这里写出来的。这些纸都是废纸，当时买不到纸，这个纸是我们祖上的经单簿拆了来写的。

李盛照在父亲坟前鞠躬。

李盛照：给您老人家敬个礼。（向记者）我父亲是饿死的。我的一个姑姑也是饿死的。……还有诗歌集。当时只有一盏煤油灯，在这儿写的。本来我就得了水肿病，这样没日没夜地写，使我的病更沉重，就几乎把命都送了。

欢庆的游行队伍……

歌声起：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字幕：

1962年 从上书到劳教

李盛照蹒跚来到原文庙旧址。

李盛照介绍：（这里）叫做文庙，真正的古文庙。当时饿殍的地址就是大门口对到这里。

李盛照蹒跚走过街道。画外音讲述：

我自己美化自己的话，我是完美主义者。当时之所以选择政治经济学，无疑是受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社会主义天堂那么好，我也要为它添砖加瓦。所以我原来作为新犹太教徒，虔诚的教徒，新犹太教徒——就是马列主义。结果发现完全是骗局。把农民的土地、自留地没收了以后，那就只有赤手空拳了。而这个割私有尾巴理论，是根据列宁的小生产者无时无刻不产生资本主义……实际上祸根从苏联、从列宁开始。它这种理论就是杀人理论、吃人理论。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就必然导致必然结果——权力的集中，把农民就变成奴隶了。100%的奴隶，一无所有的奴隶。

背景歌声：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坚决跟着共产党，要把伟大祖国建设好，建设好！……

李盛照来到他曾邮寄上书的原邮电所旧址前讲述：

当时这就是邮电所，邮电所有个木头的信箱，把它丢到里头就行了。

记者：你寄那些信分别从哪些地方寄出去的？

李盛照：这是一个地方嘛，还有县邮电局嘛，另外就是列车上。

记者：你列车上是咋个寄的呢？

李盛照：列车停站的时候啊，往北的不管它往哪儿，当时列车专门挂有邮政车厢……汽笛长鸣，列车行进……

镜头推进电脑屏幕上显示的马寅初信手迹。李盛照读信：

7

马寅初先生复四川隆昌李盛照先生函

盛照先生：

大函敬悉。甚佩

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并怜先生所遭遇的苦难。我的爱人和小儿亦犯同样的毛病，现已得救。附上票洋五元，不能说帮助，略表敬佩之忱。不多写了。顺祝早日康复。

马寅初 1961年9月

李盛照：我人微言轻嘛，认为邓子恢当时是农村工作部部长，党的农村工作部部长，行政上是国务院副总理。看这些人晓得情况后，能不能采取些措施少饿死些人。当时就是这样想的。邓子恢的回信嘛，正文由他的秘书书写，他亲自签名发出来。他把这些信转给李井泉，向我介绍，李井泉是西南局书记，老红军，喊我直接向他反映情况。结果这是我的入狱通行证。我拿到这封信到省委去，想见李井泉。一个穿棉衣的工作人员，在省委，商业街吧，门都没让进，那个人就说情况都晓得了，你赶快回去。我回去第二天，就被川大把我送劳教了。

记者：把你带起走，你当时有没得意识，有可能是你的信给你带来祸事？

李盛照：当时明显晓得。在图书馆后面，我正在那里走，一部小轿车，伏尔加的银灰色轿车，悄然开到身边，车门开开一把就把我抓进去。开起经过九眼桥到梁家巷办手续。办完手续就把我送到天回镇，那个厂还在，叫四川磨床厂。

四川磨床厂大门。

歌声起：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

了人民立功劳！……

字幕：

1962年3月 关进劳教工厂

音乐……李盛照年轻时照片。

镜头从楼墙上“成都监狱”四个大字拉开，拉到大门口，大门边的大字是“四川磨床厂”。

李盛照：当时的劳教办公室就设在磨床厂。首先就一顿饱打，当胸一拳，当然就打倒。拳打脚踢，用《水浒传》的话说叫做打下马威。然后就丢进牢房。当时的牢房是普通的职工宿舍改的，通铺没有隔。当时的犯人颠倒睡。当时的牢房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假如翻身，要喊一二三，同时翻身，免得影响。节省占地面积。假如因为翻身你把我的脚撈到了，我把你的手撈到了，因为打斗造成牢房的混乱，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我第一次戴铐子是在磨床厂。当时的管教股长叫袁修林。我说，袁股长，我犯哪项罪，要关到劳改队？他说，你这是反改造！当时二话不说，就喊人给我把铐子戴起。

李盛照读旧作：

《铐刑》

我问因何罪 因在劳改队

股长即说抗管教 丢入禁闭戴背铐

水肿体衰无力气 跪地无手站不起

绝食三天怕我死 强灌鼻食又叫医

求生不能死不了 天地不应我哀号

铐开血肉糊手腕 苦刑铭身留污斑

8

李盛照：有洋铐和土铐之区别。洋铐是美国式的，带齿轮的，戴起一捏，齿轮就嵌……（展示手腕伤痕）你看，残迹。当时戴的背铐，人一背转去的话，人就只能像猪狗一样用嘴来吃。我当时只有绝食。绝食，我的记录是六天，大概是六二一二，140小时。我当时已经昏迷，人事不省，已经休克。同牢的犯人说，给你灌了好多盐水针。现在叫盐水针或者……我的身份比较特殊一样，我记得当时劳教办公室的主任清点人数移交的时候——劳教办公室移交给劳教厂，移交给新生电机厂，念名字念到李盛照名字，他说，你还是普天下写文章的角色。

字幕：

1964年9月 由劳教升格为反革命

歌声起：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的歌声传四方！革命风暴席卷全球，牛鬼蛇神一片惊慌。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

李盛照申诉信手稿……

字幕：

李胜照在劳教工厂和看守所 不断写申诉信并设法外寄

李盛照：我在劳改队又在写。当时明明晓得要倒霉，但是愤怒情绪，愿意冒这种险，

也无所谓了。写的啥子东西呢？《四川劳改队状况及改善劳改队经营管理及大赦的建议》。我写这种东西，还找得到的。所以这就又是现行反革命，所以就正式逮捕。我记得清楚，64年9月30号，从磨床厂逮捕到宁夏街。因为劳改队都有规矩：节日前夕杀人逮人。因为它为了保持节日的安全，这是劳改队的通例。劳改队杀人都是节日前夕，或者五一前夕，或十一前夕。写了的话，我当时准备……通过官方不可能寄，我通过一些……刚进去认不到人，都是陌生人。我想请他们帮我寄出去，但这些人……劳改队简直是铁桶江山一样，没准寄不拢就送到管教股去了。当然就成了我的罪证，攻击无产阶级罪证。

监狱高墙。

检举字条特写。李盛照念：

这是昨天洗澡后，李盛照托我交出去的信，特向政府提出检举。

李盛照：（笑）这就是做游戏了。

记者：你给这些人包括毛主席等等写信，你当时有没有想过可能根本就寄不出去？

李盛照：当然完全想到过。所以想了个奇招怪招，寄点希望。万一某一个人……我都有附言，说请你帮我寄出去。当然这个肯定一个都没寄出去。

读当年信：

朋友，你会骂我荒唐吧？不但素不相识，而且面都没见过，就把救命大事相托。不，我之所以这样冒失，是由于我相信你的理智、良知和正义感，首先请不怀偏见地读完，然后当正直无私的法官，作出你的判决。你如向干事检举，使我戴铐子我也不埋怨你，是我自讨苦吃。作为为人民饿死喊冤而坐牢的政治犯，决不会出卖任何人也不会连累任何人。请留下姓名。如得不死，一定答谢。李盛照拜书。

9

李盛照：在宁夏街看守所，他的衣服晒在那个看守所的空坝里头。我就把微型信封塞在他的衣服口袋里。当时没得其它办法，只有希冀奇迹出现。当时逮捕又不需要什么罪证。如今天处理李盛照，马上宣布一个成都市公安局的逮捕令，就算逮捕，戴起刑具铐上铐子就押走了。

音乐……李盛照手稿上叠印文稿标题：**致故乡**

字幕：

我控告李井泉

李井泉陪同毛泽东视察（照片）。

在李盛照当年写于监狱所发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书中字行间的文章上叠印他对形势的批判要点：

- 1、破坏社会主义民主
- 2、公社是农业破产的绞索
- 3、大炼钢铁破坏了国民经济比例
- 4、五千万饿死，两亿人得水肿
- 5、捏造成绩，粉饰太平，监狱人满

在李盛照手稿上叠印文稿标题：

致狂热过的人

李盛照：第一次判刑十五年。检察官读完起诉以后，我抢先发言，我说我不是被告我是原告，我控告李井泉饿死四川一千万人，也列举了一些数据，哪些生产队饿死好多人。检察官高儒进和审判员指责我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你们把专政当成命根子，但是你们对什么样的人进行专政？其中有吃人肉者……检察官没有答复。

记者：你咋会把它写到一本书上？我不明白。

李盛照：没得纸。我不可能有纸噻。没得纸。这是监狱当局发的一本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了改造我的思想，叫我写交代材料，写检查，就必然要给笔给墨水。我就在这上面涂鸦了。

李盛照：判刑 15 年。我写了一本上诉书：《四川的饥饿及因果之研究》。我不是被告我是原告。我控告对四川人民的下列罪行——

- 1、饿死一千万，水肿病三千万，生产倒退三十-五十年；
- 2、监狱、劳改队犯人数量的持续大跃进，由 57 年的五十万增加到 64 年的三百万；
- 3、对饥饿者的专政，公社化——共产风绞杀了农业，除不定量的特灶，经常大量盗窃而不受惩罚的（以外）……百分之九十五人挨饿；
- 4、大炼土铁破坏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扰乱了再生产进程，造成崩溃性经济危机的祸根；
- 5、制造亩产八万斤的骗局及种种起杀人作用的倒行逆施；
- 6、欺上压下，陷害忠诚，奸邪当道，祸国殃民。

李盛照：《驳自然灾害论和外因论》……我在 1957 年、59 年、60 年……为防止灾难的种种无效努力，我为民请命，（遭到）残酷迫害的经过……

记者：这些资料你是从哪个地方拿出来的？

李盛照（指着手稿）：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他们耍的花样呢，是发还重新定审，就说引用的法律条文不当，重新审简直像儿戏，明明是做的过场，只有三个人：审判长王兵，审判员陈志德和一个年轻姑娘做书记员。十分钟就走完过场了。

记者：当时宣判的是好多年呢？

李盛照：最初原判第一次判是十五年，后头再判就是二十年了。

记者：也就是说你上诉后反而判了二十年？

李盛照：啊，而且引用的法律条文是同一个《惩治反革命条例》同一条款。

李盛照在幽暗的屋里走动。

李盛照：老糊涂了……这个药才敲得好贵哟！

李妻杨素华：拿来，这个也是一片。

李盛照：我去跟那个……喊他开门。

李妻：开门干啥子？

李盛照：搁车子。

李妻（不耐烦地）：搁好了，竭跟你说！

李盛照：人家到隆昌来，把车子给人家掉了，你咋个跟人家交代？

李妻：那跟前搁好多车子，公安局的……

李盛照：搁好多车子，它是好车子。万一偷了咋个办？

李妻：你硬咬得很。

李盛照：我就是咬，还要咬赢。

李妻：你咬赢……你去……哎呀！

李盛照：就跟谢师傅说一声，喊他开一下门，拿一块钱给他。

李妻：人家没得事，那么多人的车都搁那儿。

李盛照：又没得专人管……

李妻：你去你去，爬开爬开，不要跟我讲……

李盛照：你就是毛泽东喜欢的工农兵。

李妻：屁话多。

李盛照：你不晓得啥子叫或然率。所以毛泽东喜欢的工农兵，无知无识，喊你去杀人，你就去杀。

李妻：屁话呀，我说你！找龙门阵摆

李盛照：找龙门阵摆……

客人：一辈子都在搅他那些陈古八十的老龙门阵。

李妻：哦，就是说他……没得新的。

客人：发了霉的老龙门阵。

李妻：就是爱啰哩啰唆的啊……

歌声起：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天安门前狂热的红卫兵人群……“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浪……毛泽东在检阅……

字幕：

1966 年 11 月 进入监狱

李盛照一边拧毛巾洗脸，一边讲述：

他写了一本柳叶溪的故事，以劳改队为背景，好像写成疗养所那个味道了，打、铐、捆酷刑根本不敢写。66 年 11 月 7 号，从宁夏街押到苗溪茶场。当时就入监学习嘛，要认罪。但是我觉得我莫得罪，而且我申诉，我为啥子莫得罪呢？我一直坚持我的观点，我控告李井泉饿死一千万人的罪恶。人家说你这个反动，不认罪就该挨打，斗争会上就殴打我，我就反抗，我就对打。结果就把我抓起给我戴上脚镣手铐，关入小监。我在黑牢写了一段《人间地狱——小监》，小监是长一米八，像我一米七八，刚好装得下。宽是一米二，高是二米五。就这么一个真正的活棺材。而且一米二宽加六十公分的木板作为床。它也有窗，大概是 30 乘 40 公分，首先有四根拇指粗的钢筋，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是十二片百叶板，百叶板往下斜。这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免得外面投递啥子东西进去，另外就遮阳光了，这是第二层。第三层就是玻璃窗。玻璃窗也是双层玻璃，而且每层上都涂的蓝漆，所以里面方基本上伸手不见五指。钢筋水泥的房子是密封的，尿尿的蒸汽到顶上，蒸汽变成汽水，所以成天都滴水不停。

记者：你在这个小监里住了好多年？

李盛照：从 66 年 11 月开始……67 年开始，到 76 年都住在这个小监里。

记者：住了十年。平时给不给你们戴脚镣手铐呢？

李盛照：哎，我一直戴起脚镣手铐的呢。刚刚解脚镣……你看，现在都还看得到……

李妻：这个脚颈颈，这里跟那里，那个箍箍……才出来的时候，脚箍箍——这儿绿阴绿瑕的。哎呀，你看你看，他喊不吃药，这些不是疤疤？红的，你要吃药！

李盛照：我 67 年 10 月开始戴脚镣，戴到……宣读毛泽东、周恩来签署的一个文件：取消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把我从小监调出来，给我开脚镣。我的脚镣是最轻级的：二十八斤，二十八啊，啊，逃跑犯的是五十斤。开脚镣的时候，四块那么高，拇指厚的四块铁板夹到，U 字型的铁板，两块夹到，然后铆钉铆起，把铆钉锯断后，才能把脚解放出来。锯铆钉那个味道比受酷刑都恼火，一个钢锯，往复可以锯到一丝，把四根铆钉锯断，起码花了一个多钟头。锯铆钉相当痛苦。为啥子呢？震动波从脚传递到大脑，心脏简直受不了。那个锯齿，锯铁要发出噪音，那样子过了十九年。把那个吊起……

李妻：想跑也跑不脱。

李盛照：那个时候没得本事跑嘛，也跑不动。跑出来，你想，你没得外援，不会偷不会摸不会扒，你只有饿饭的……镣链大概是五十公分长。把镣链用根绳子拉起来，然后吊在腰杆上，所以可以蹒跚走路。十三队是个农业生产队，收割季节要收包谷，收麦子的季节，晒场上需要人，就把小监这些戴脚镣的人，弄去管理晒场，去帮忙铲谷子这些。十几副脚镣那样子叮叮当当地走，简直轰鸣，多远都听得到的。

美丽的县城夜景。画外响起脚镣声……

字幕：

李盛照 1980 年 3 月被平反 4 月出狱

李盛照坐在社区广场看跳舞。

李盛照画外音：我 1930 年出生，已经满了八十，今年虚岁就是八十一岁了。死在刑场和死在病床上没得区别，都是死亡。我已经无所顾忌了，你就抓我，带个信我都去。希望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代，给将来写饥饿史的人提供可靠的信史。

脚镣声和舞蹈音乐声交织……

李盛照蹒跚行走在夜晚的县城街道上。

字幕：

导演 谢贻卉

编辑 胡杰 谢贻卉

摄影 谢贻卉

鸣谢 彭慕陶

特别感谢以下音乐、歌曲的词曲作者和演唱者

《The Grand Duel (Parte Prima) 》

作曲 Luis Bacalov

《社会主义好》

作词 希 扬

作曲 李焕之

演唱 张 楚

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

词曲 李劫夫
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作词 李郁文
作曲 王双印

声明
本片背景音乐均来自互联网
<http://www.mp3.baidu.com>
请相关权利人自本作品发布之日起
两年内 与作品所有人联系主张权利

2012 年 2 月制作

天地有正气

——纪录片《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观后感

何蜀

13

有关毛泽东时代“三面红旗”造成的大饥荒的纪实与回忆作品，近年已经出了不少，但以纪录片形式出现的，除了几部只听说而没看到过的以外，这是我看到的第一部。

这部纪录片展示的，还不是大饥荒那些惨痛而恐怖的历史画面，而主要是通过片中主人公李盛照对大饥荒真相的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的上书揭露，显示了一种数千年来由中华民族一代代志士仁人薪火相传的浩然正气。

关于四川的大饥荒，当年有不少人向中央上书报告，揭露真相，呼吁救助，他们中有平民百姓，有普通共产党员，有地方干部，有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代表……其中最典型的，是重庆的几个市级干部：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于克书，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市委书记廖伯康，他们有的（如于克书）向中央写匿名信报告，有的（如廖伯康、于克书）当面向中央书记处杨尚昆汇报，有的（如萧、李、廖）向中央派来四川微服私访的人提供材料……后来他们被李井泉打成所谓“萧李廖反党集团”，遭受长期迫害，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得到平反。

和他们比起来，本片主人公李盛照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但不是干部，不是共产党员，甚至连“人民群众”都不是，只是一个既有“原罪”（出身于地主家庭）又有“现行”（在四川大学因批判斯大林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专政对象”。在他上书报告四川饥饿死亡情况后，竟被自称“为人民服务”的当局视为大逆不道，将他送去劳教，在劳教工厂和看守所，他仍然坚持上书，将自己亲身所见所闻的饥饿死亡情况报告给他认为理应听取民间呼声的“公仆”们。然而，“公仆”们又进一步把他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到了这种地步，他居然还在想方设法上书……真可谓百折不挠，宁关不屈，以命相谏！

特别让我感动和震撼的是，在法院对他进行宣判时，他竟在法官读完判决书后抢先发言，慨然宣称：我不是被告，我是原告，我控告李井泉……真是掷地有声，气贯长虹！

在李盛照身上可以看到古代忠臣“文死谏，武死战”的精神——虽然他不是“臣”，只是“民”，

而且只是被“无产阶级专政”踩在脚下的“贱民”。其实，当年“右派”中的许多人，都是像李盛照一样，并非想要“反党”，只是一心想要助党、救党，才勇敢进行忠谏而遭灾的。他们的命运正反映出这个执政党自身的内在矛盾：既要培养忠诚正直之士来为自己效劳，又不容忠诚正直的意见随便发表。许多遭到打击的所谓“反党分子”都是这种内在矛盾的牺牲品（民主国家的现代政党里绝无“反党”一说，因为在那里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是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李盛照就是这种由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反对派。他在部队上学习侦察参谋业务，侦察参谋条例说，侦察员要做独立工作，做好调查，给上级写报告。他就有了这个“独立做调查并向上级报告”的习惯，加上他从部队复员后考上川大，学的又是经济，对经济、对农业生产状况就很感兴趣，所以当时就做了粮食情况调查，还曾被《四川日报》（四川省的“党报”）的内部刊物《情况通报》采用过，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就养成了做调查、反映群众生活生产状况的习惯。正如他给郭沫若的信中所说：“我是吮时代的乳汁长大的，将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时代精神。”当年许多“右派”都抱着这样的信念，满怀赤诚，却没想到会被这个他们衷心爱戴、一心忠于的党打下十八层地狱。

李盛照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受到诬陷打击之后，没有违心地认错检讨，以曲求伸——像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做过甚至多次做过的那样，反而更加清醒更加执着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沉痛而肝胆俱裂地向全党、党中央及一切头脑清醒的人和健康力量呼吁：以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为重，不顾甚至违犯任何权威（哪怕他曾有过真正贡献）的意志，而立即行动起来，召开九次党代表大会，从政治、组织、思想上清算教条主义，查明造成的全部恶果，追究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开除出党，交法庭审判……”

何等的见识！何等的忠勇！

很难想象，这样一些振聋发聩的文字，是一个困居乡间、已经得了水肿病的“右派分子”，在农舍的煤油灯下，用祖传的经单簿上拆下来的废纸，没日没夜地写出来的。

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李盛照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近年来，有些“左派”人士否认毛泽东时代有过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否认曾经在“三面红旗”下饿死过上千万人，甚至还有李井泉的亲属公开写文章为其辩护和涂脂抹粉……在李盛照老人的亲身经历面前，在本片中那些从档案中找出的当年“反革命罪证”实为历史见证的饥饿死亡报告面前，不知他们还有何话说？

当我看到李老讲述其被囚于单人牢房的情景时，不由得想到了文天祥在其著名遗诗《正气歌》的序中所写：“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文天祥历数此单人牢房中之七种污浊之气，“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然尔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李盛照所囚的单人牢房，比文天祥所囚之“土室”更为窄小，并且还更加恶劣地被加戴了脚镣手铐甚至“背铐”。李盛照被囚于此的时间也远比文天祥的两年更长（将近十年），然而，李老凭着满腔浩然正气，威武不屈，以孱弱之身谱写了又一曲正气歌！

大饥荒见证人李盛照还活着，这本身是个奇迹，他或许就是老天为了垂怜这个苦难的民族而留下来的人证。感谢成都的“右派”彭慕陶老人力荐，感谢“川妹子”谢贻卉寻访到了李盛照老人，给我们抢救拍摄下了这些宝贵的镜头，并经由胡杰剪辑制作成这样一部纪录片。当一些故事片大导演正在尽量逃避现实、远离生活真实，以大投入、大制作以及高科技等等炫目手法包装那些哗众取宠的无聊故事愚弄观众，徒然留下历史笑柄的时候，却有胡杰、艾晓明和谢贻卉这样的纪录片独立制片人在默默地深入生活，直面现实，抢救记忆，留下宝贵的历史与现实记录。

谢贻卉是独立制片人队伍中的一个新兵。2008年四川地震后，她有机会协助中山大学艾晓明

教授拍摄川震纪录片。在这个过程中，她对用镜头纪录人的生活 and 心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从未系统地学习过纪录片导演、拍摄和剪辑的知识，只是在协助艾晓明教授工作期间，耳闻目睹了一些拍片技巧。随后，在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胡杰和艺术家艾未未的激励下，2010 年春，她扛起借来的摄像机，开始采访拍摄一个有关“右派分子”的历史故事。这之后，她就把自己一步一步从一个人力资源管理者转换、定位到了“独立制片人”的社会角色上。艾晓明和胡杰成了她的两位“师傅”。她说：“我很幸运，有两位师傅。如果没有他们无私的帮助，我恐怕很难迈出这一步。”

就是在第一次采访“右派”故事期间，小谢到重庆来和我见过一面，我为她自觉自愿而且自费投身于纪录片独立制片人这一艰苦行业而深感佩服。不难想象她在工作时会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后来偶尔得知她为追踪某个采访对象又到了某个县城，眼前就会出现：一个斯文的“川妹子”，独自背着背包，扛着摄像机，风尘仆仆地穿行在陌生的街道和喧闹的人流里。她曾告诉我，有一次为拍一个 8 秒的镜头，乘坐凌晨到站的列车，和列车员费尽口舌，等解释完列车已经开走，最后只拍到一幅勉强可用的画面，声音却完全报废，为此还得在火车站候车室里睡上一觉，等待天明再录声音，甚至再坐一次那趟火车……不过我相信，尽管辛苦，她所采访到的李盛照们，又给了她许多感动和激励，许多启示和教益，采访的过程往往又成为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从那些采访对象的讲述中，从那些历史档案故纸堆发黄的纸片中，从那些或惊心动魄或娓娓动人的故事中，总能让人感受到弥漫于天地间的浩然正气。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过去的人们只能从“展书读”中感受先贤的精神风貌，现在人们又多了纪录片这样一种接受媒介，可以更加直观、更加生动、更加印象强烈地面对那些日益远去的前贤的音容笑貌，感受其凛烈万古的浩然正气了。

愿有更多的观众看到这部纪录片。愿独立制片人们贡献出更多这样的纪录片。

当年罪名

——解读当年开除孙铭勋党籍的组织决定

孙丹年

1952 年 4 月 10 日，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头版用黑体大字公开登载了《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委员会关于开除孙铭勋党籍的决定》，给孙铭勋罗列了一堆吓人的罪名。但是，历史是最好的审判官。几十年过去后，现在回头再看，当年的“义正词严”，竟都是污蔑不实之词。（当年的剪报见第 40 页附图。）

（一）

我们先看看孙铭勋是怎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孙铭勋年轻时曾经打算做一个纯粹的教育家，不大过问政治。但是教育家不找政治，政治却要来缠着他使之不得安生。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学校于 1930 年被封闭，孙铭勋无辜被捕坐牢三个多月。获释出狱后，孙铭勋由原来较为模糊的政治倾向，转为比较明确的

政治观点，认为：现存政府是一个不讲民主的坏政府，在它的统治下陶先生创立的“生活教育”难以实施和发展。

1931年孙铭勋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通过“教联”，他初步接触到共产主义理想，靠拢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秋天，孙铭勋由陶行知派到广西教育研究院幼稚师范班任教。到南宁后没几天，当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人就找他谈话，这与他长久在政治信仰上因苦闷而彷徨而寻求出路的思想一拍即合，很快就宣誓入党。

1936年秋天回上海不久，因同住的党员被捕，孙铭勋紧急撤离到了西安，失掉党组织关系。为了找到一份合适的教职糊口，12月上旬孙铭勋辗转来到延安，在肤施师范学校任教。

当时延安由张学良的东北军控制。据郝在今著《中国秘密战》一书中记载：

肤施师范学校是当时延安唯一的一所师范学校，这里也是国共争夺焦点。红军接管延安前，延安处于红白拉锯战之中，校长擅自离职，学校就由进步教师孙铭勋、林迪生掌管，许多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倾向共产党……

孙铭勋到肤施师校第4天，西安事变爆发，形势异常复杂，瞬息万变，张学良的东北军退出延安，红军开入延安城。孙铭勋看见红军，非常激动，立即找到以前熟识的红军土地部长王观澜，要求重新入党。因为都是熟人，互相了解，所以不多久就批准重新入党了。

这时延安师范学校由边区教育部长徐特立亲自兼任校长，孙铭勋受到尊重，受到重视。据《徐特立文集》第110页《政党与政府》一文中，为了说明由政党所组织的政府中，不必要所有的负责人全部都是党员这一点，举孙铭勋为例：

……苏联只有一个政党，而政府中负责人不一定全是共产党员；1930年，苏联联邦中的日尔曼共和国的劳动部长便不是党员。……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时教育部就有许多非共产党员，其中科长如赖子玉君，冯观潮君都不是党员，师范学校校长罗欣然也不是党员。目前边区政府柯柏年任编审科长，董纯才任科员，均不是党员。不久以前，孙铭勋由边区政府主席团委任他为教育委员，而孙是延安师范的教员，亦非党员（延安师范是陕西省政府办的）。

从徐特立的这一说明中，可以推测当时正是孙铭勋已经和党组织联系上、却又还没有履行重新入党手续的时候。

1937年4月，因为工作需要，上海生活教育社要孙铭勋回上海，经过王观澜、博古二人决定，孙铭勋离开延安回到上海。

抗战爆发，孙铭勋随着生活教育社同人一起经武汉撤退到重庆，这时他的党组织关系由董必武联系。皖南事变后，孙铭勋辗转撤退到甘肃、贵州，党组织关系转为由南方局文委的徐冰联系，直到抗战胜利。

在1946年底全国“反美抗暴”大规模示威游行中，重庆各校师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1947年2月，学生运动遭到镇压，许多学生被军警打伤，包括育才、社大部分学生，造成重庆“二五”、“二八”惨案。孙铭勋参加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在各报上签名声援学生的行

动。

1948年夏天，重庆发生“挺进报事件”时，许多党员撤退离开重庆，孙铭勋担起了育才学校重庆分部主任的重担，他一边思考育才学校解放后的发展规划，草拟了《育才学校的道路》大纲（刊登在1950年7月21日《新华日报》上）；一边参与对国民党军队的教育策反工作，通过内线关系，他参与了促成国民党第四十七军军长杨熙宇的起义。还派遣学生周竞等人打入国民党二三九师策动起义，因行动不慎泄露风声，起义失败，周竞等人被捕入狱，经党组织大力营救，到解放后才出狱。

1949年11月下旬，为了组织力量迎接解放军进城，孙铭勋通知疏散到附近各区县和成都等地的老师同学火速返校，由育才同学制作了山城第一面五星红旗，重庆解放当天，这面红旗高高飘扬在抗战胜利纪功碑上。

（二）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执着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探索和实践，孙铭勋婉辞了让他担任重庆市文教局副局长的任命，被任命为重庆育才学校第一任校长、党支部书记。孙铭勋兴高采烈迎来的却是育才学校和他本人的厄运。

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对待昔日的同盟者知识分子，成为执政党的一个重大问题。当时的知识分子，其主流都是社会精英，主要传承着西方的民主科学精神。

历史上，在民主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的知识分子，普遍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理所应当是“革命知识分子”。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都应当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但是在轻视文化、轻视教育科技的思想支配下，尤其是在敌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国家的情绪支配下，所有的知识分子全部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全都遭受严重歧视成为批判改造的对象。重庆解放之初，一位副市长这样说过：

凡是在旧社会是做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是或多或少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都是有意无意的做了它的帮凶。

这就是说，所有的知识分子全都改变性质，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既然政治上归属于敌对阶级，就产生了改造思想（然后再使用）的问题。

今天，回过头来分析这个几乎令中国所有的现代教育家都跌入炼狱的过程，看一看50年代初期政治运动起于青萍之末、至文革臻于极盛的早期发端，实在是很有益处的。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是为了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扫清障碍。

育才这种民办的、有自己独立教育思想的学校很快就办不下去了。1951年掀起的批判武训运动，连带否定了中共以前一直肯定和支持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满怀宏图大志的孙铭勋完全没有想到，他所继承和弘扬的陶行知“生活教育”理想，会与党中央的教育方针产生尖锐矛盾。新教育方针演变为让所有教育家避之惟恐不及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紧接着，“三反”运动中，孙铭勋又被诬为“贪污犯”、“大老虎”，被非法关押，工作组还挑拨师生关系，软硬兼施发动学生起来斗老师。悲愤绝望的孙铭勋以自杀抗争，回答他的自然是更为严厉的处分：开除党籍。

1952年4月10日，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各大报在显著位置用黑体大字、登载于头版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委员会关于开除孙铭勋党籍的决定》，至今已经60年了。当事人以及牵连到的人，绝大多数都已作古，而该《决定》中，大量捏造

事实、信口雌黄，污蔑不实之词，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之下也逐步得以澄清。

这里，对《开除孙铭勋党籍决定》中指名点姓提到的部分人和事略作交代。

1、关于“介绍参加过三青团的李能寿入党”，《决定》中是这样说的：

孙铭勋在担任育才学校支部书记期间，拉拢私人感情，介绍参加过“三青团”的李能寿入党，而不将彼等政治情况向组织汇报。

关于李能寿，所谓“参加过三青团”的事实为：抗战期间李能寿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有个名叫段绍祖的同学，拿来一张加入三青团的表格，叫李能寿填写。李能寿知道段绍祖并不是国民党员，这张表格很可能也是别的同学拿给他的，因为当时经常有青年学生被强行要求集体参加三青团或国民党的事情。李能寿没有多加考虑就填写了这张表格。但是从此没有了下文，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三青团的任何会议、任何活动。解放后，李能寿主动向党组织谈出曾经填写过三青团表格这件事，当时组织上答复他说：“这是过去了的事情，虽然填过表格，但没有参加活动，并无任何恶劣影响，就此了结。”批判武训运动中将这件事扯出来是为了给孙铭勋加罪。批判武训运动结束后，党组织曾经派出专人，辗转找到当年李能寿在武汉大学的同学段绍祖进行调查了解。段绍祖早已将此事忘了，想了半天，他说李能寿从来没有参加过三青团的活动，在同学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李能寿 1946 年在成都参加生活教育社，1948 年冬天由地下党介绍到育才学校当教员，不久由孙铭勋介绍入党。1951 年夏天孙铭勋被迫离开育才，市文教局局长亲自找李能寿谈话，提拔他担任育才学校代理副校长。孙铭勋被开除党籍时，组织上找李能寿谈话说：“现在停止你的组织关系，因为你入党的主要介绍人孙铭勋已经没有了党籍，你的党籍自然也没有了。但是需要你仍然担任代理副校长。”这种入党介绍人出了问题株连被介绍人的作法也是很荒谬的。早期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其中有后来自动脱党的、有成为叛徒、汉奸的，有被开除党籍的，但是经由他们介绍入党的人的党籍并未受影响。

1953 年起，李能寿作为非党人士，担任育才中学第一副校长，文革中一度靠边站。文革结束后重新入党，1980 年担任校长。经过他的多次申诉，1985 年底重庆市文教局通知他：“彻底平反，党籍从 1948 年算起。”他在校长岗位上一直工作到 1986 年离休，现仍健在，办过了 90 大寿庆典。

2、关于“包庇国际间谍陈咏新”，《决定》中是这样说的：

（孙铭勋）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包庇反革命分子，潜伏该校之国际间谍陈咏新。陈犯为掩护自己，曾送了育才一些仪器，孙铭勋则宣传陈犯为“好人”；陈犯被捕后，孙铭勋竟到公安局大吵大闹。

关于这位“国际间谍”陈咏新，孙铭勋一点也没有隐瞒对他的欣赏与感激。1950 年 7 月 21 日《新华日报》第 6 版孙铭勋发表《育才学校的道路》一文，对于陈咏新的作用是这样肯定的：

……过去本校不但没有房屋，而在物质设备方面，也是想象不到的异常贫乏，自从 1947 年各组搬到上海后，留在重庆的部分，从桌椅，床铺，工具到图书馆，乐器，仪器等等可以说是等于零，大部分是借用别人的。但目前的自然组却是异军突起，所有设备，和重庆各个中学比起来，要算首屈一指，而这又都是陈咏新先生多年血汗积累下来的捐赠品。

后来陈咏新被公安局逮捕，孙铭勋去公安局请求释放，无论出于上下级关系还是出于友情分，都是正常的。

至于陈咏新是否国际间谍，并无确凿证据。据李能寿说，文革结束后他专门对陈咏新搞过调查。陈咏新解放前曾在一个美国驻中国的机构（李能寿只记得这个机构名叫什么“馆”）里工作，他手中掌握着一批器材，刚解放时他把这批器材捐给了处于极度贫困中的育才学校。孙铭勋很高兴，让陈咏新担任自然组主任。然而批判武训时，工作组认为他“既然是从美国的机构里出来的，肯定是美国间谍”，将其逮捕关押。孙铭勋则向公安机关要求释放他，所以“包庇反革命分子、国际间谍”的吓人罪名也扣到了孙铭勋头上。批判武训运动结束后，陈咏新被公安部门释放但加以控制。再后来他去了成都。文革结束后，李能寿请学校正式向有关方面发去公函，了解陈咏新的情况，但是没有答复。李能寿不死心，又发信向在成都工作的、曾经担任过育才自然组教员的曹世锡先生询问陈咏新的下落，曹世锡回信说：“……经过历次政治运动，陈咏新没有问题。”那时陈咏新还健在。

《决定》公布将近 30 年之后，1981 年 5 月 8 日，重庆市教育局党委在《关于孙铭勋同志党籍问题的复查报告》中，谈及有关陈咏新的问题时，依然坚持旧说，称：

19

关于孙在“镇反”中包庇重用坏人问题，经复查，不是有意包庇重用坏人，只能说是坏人千方百计钻进育才学校，掩蔽其反革命面目，是警惕性不高造成的。

3、关于“被孙铭勋引为心腹的中统特务宋怀中”，《决定》中这样说：

中统特务宋怀中（该校总务主任）亦被孙铭勋引为心腹，学生均要求逮捕，而孙铭勋竟公然压制学生对宋怀中的斗争。

被诬陷为“中统特务”的宋怀中，贵州人，曾是南京晓庄师范的学生，与孙铭勋既是同学也是同乡，在孙铭勋创办迈皋桥幼稚园和上海劳工幼儿团时，曾大力帮助过孙铭勋。宋怀中解放前在贵阳谋生时，不得已填写过参加特务组织“蓝衣社”的表格，但是没有参加过任何特务活动。解放后他在贵阳文教系统工作时，主动向组织坦白了这段历史，组织上也明确表示“这属于已经了结的问题”，一度还重用过他。因宋怀中有较强的事务能力，孙铭勋请他到育才学校来从事总务工作。批判武训时，为了给孙铭勋加罪，工作组听信道听途说得来的材料，不顾事实，使宋怀中也遭到迫害。文革前夕，宋怀中去逝。

4、关于“介绍地主邝和到政府工作”，《决定》中这样说：

地主邝和（为破坏农会而被捕过，三反中又已暴露其严重贪污行为拘送法院），介绍到四区人民政府工作。

邝和是 20 年代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40 年代曾经在四川省粮食厅当过科员，抗战胜利后失业。为了谋生，给驻白市驿机场的美国空军当过翻译。虽然经历复杂，却并非“不法地主”。而且邝和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解放军，其中一个当时正在贵州剿匪前线打仗。解放初他来重庆找女儿邝忠龄（育才学生，学运骨干，后为孙铭勋之妻），是由当地农村基层组织开了路条的。孙铭勋为邝和找工作，辗转介绍到重庆第四区人民政府民政科工作。邝和是革命军属，民政科组织军属开展“生产自救”，其收入的存折由邝和保管。正是因为保管这个存折，“三反”运动中不问青红皂白，把邝和定为“贪污分子”并对其进行批斗。经过内查外调，所谓“贪污”没有作任何结论，后来不提了，不了了之。邝和于 1954 年去世。

（三）

“坚持陶行知教育路线”居然成为大罪并引出这些严重的罪名，孙铭勋当然不服。1957 年鸣放中，对建国后将陶行知教育思想打入冷宫并妄加批判的错误作法，孙铭勋据理提出批评意见，于是跌进“阳谋”陷阱，又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在大饥荒中病饿而死。

当年作出开除孙铭勋党籍的决定，给孙铭勋加上一堆诬陷罪名的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是张霖之，拍板定案的是当时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任白戈（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也是找任白戈写的材料）。后来，张霖之在煤炭工业部部长任上被毛泽东钦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中也被加上了一大堆诬陷罪名，被批斗、毒打致死。在文革爆发时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任白戈，则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诬陷为重庆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派当权”，宣布打倒。

孙铭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平反（张霖之、任白戈当然也同样得到平反），但是，遭受毁灭性摧残的中国教育事业，却并没有迎来真正的转机。

文革结束，经过田伯萍、胡一禾、刘博宇、楚图南、胡晓风、贾培基、邝忠龄以及其他许多热心人的共同努力，1979 年 1 月，孙铭勋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1981 年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

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孙铭勋仍然不能瞑目。这只是他生命的一半，至多只能闭上一只眼，另一只眼依然大睁着不屈不挠——他一定要看到陶行知教育思想重新发扬光大，一定要看到中国教育走上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胡晓风、田伯萍等老同志支持下，顶着巨大的压力，1984 年由邝忠龄编辑出版了《孙铭勋教育文选》。这是改革开放后，陶门弟子中出版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现已 90 高龄的李能寿，多年来，对当年批判武训、批判“育才立场”以及批判孙铭勋一直不能释怀，决心对这个问题正本清源。1989 年 4 月 16 日，李能寿上交育才学校一份材料，为这份材料写了按语《关于重庆育才中学“武训精神影响”及前校长孙铭勋思想的初步检查报道》，其中引用了一段话：

1985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作了这样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 9 月 5 日说：“解放初期，也就是 1951 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既然连基本正确都说不上，那就应该是基本不正确了。

1985 年在北京举行了陶行知纪念大会，此后，从中央到各地的陶行知教育研究会纷纷成立，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视，重庆育才中学校也恢复了原名。

但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远远谈不上得到了根本解决。

中国的教育家在 1950 年代全部消失，以后所有学校校长都是由政府任命的行政人员，都奉命执行某种教育方针、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至今没有真正称得上“教育家”的人出现，与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互为印证。中国的教育事业在 1950 年代开始倒行逆施，至今陷入怪圈难以自拔。

当政者如果不能正面应对这一历史悲剧，不敢正视这一历史质询，不能反省并向受害者正式道歉并给予补偿，那么，所谓“教育改革”便只能停留于标语口号。

2012-4-20

反右派运动是一个反动事件

高越农

看了《往事微痕增刊（北大特刊）》（维权历程），我感到十分憋屈，有以下意见，需要一吐为快：

衡量一个历史事件的是非功罪究竟应该以什么为标准？按照历史学的观点，要以这个事件对于历史进程起什么作用为标准。这是断定“是非功罪”的客观标准。以推进历史前进为目的而发动的事件是积极的；以阻挡历史前进为目的而策划的事件则是反动的。对于历史的进程起推进作用的事件是积极的；起阻碍作用的事件则是反动的。

否定“两个凡是”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否定对于任何历史伟人的神化。经受不住客观标准检验的论断，不论出自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必须予以摒弃。

1957 年反右派运动这个事件是毛泽东策划的，以固守在东欧已经受到挑战的一党专政的腐朽社会制度为目的，以‘引蛇出洞’并继以群众专政为手段，围剿和重创本国先驱知识分子的运动。它是新中国从承认民主共和明目张胆地转向专制独裁的转折点。它撕下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标榜的讲求信誉的面具，种下了“三面红旗”致使千万人饿死的祸根。所以，从历史学定性，从目的、手段、内容和后果看，从谋划到泛滥的过程看，反右派运动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十足的反动事件。

现在摆在历史明镜面前的，不是为“右派分子”定性的问题，而是为这个运动及其策划者定性的问题。

邓小平否定反右派运动的反动性，说：“1957 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有人说，邓小平这个说法是“言不由衷”的，这样说是为了“顾全大局”。不，这个说法是他的肺腑之言，与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一党专政的腐朽社会制度的行为一脉相承。它遏制了对于右派分子的彻底平反。

因为这个反动事件鸣锣开道，因而法西斯式的“舆论一律”思想统治和一党专政得以张扬，它以这种方法成功平息了国内的民主化思潮，成功应付了国际上的风云变幻。与这种成功相伴随的政治格局是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后继领导人留下的一笔遗产。这种政治格局有扼杀生机致使万马齐喑的必须摒弃的消极的一面；又有可以顺手拈来以维护“和谐”统治的“积极”的一面。这就是当今的最高当局既要否定又要肯定反右派运动这个反动事件的原因。在不给反右派运动以公正的历史定位的前提下，维权的右派分子们对于任何单位的请愿、诉求都是枉然的。

我因此认为，向最高当局上书比向有关联的下属单位请愿、诉求更加重要。我相信，当今的最高当局对于反右派运动灾难是不会不知情的。他们有认同普世价值的表态，有顺应历史潮流的愿望。但是，由于他们迈不过毛泽东和邓小平历史评价这个坎，对于不给予反右派运动以公正历史定位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摆脱不了“反右派没有错”的紧箍咒。所以，在上书里，着重点不

应在于申诉亲历的苦难和冤屈，而是严正指出：在自己任期内给这个反右派运动以公正的定性，对于保持他们清白的名节，将是不容错过的最后机会。上书当然应该高屋建瓴：不是当年被置于死地而未死的右派分子们如今匍匐在“青天大老爷”的衙门前，而是历尽劫波的他们奉劝“人民公仆”们为社稷的长治久安而好自为之。

所有被侮辱、损害、迫害的“右派分子”都是值得深深同情的，他们的维权和索赔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苛求于某某具体单位。我认为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并没有说错：“划右派是根据中央政策，北大不负责任，要索赔可以上法院去状告中央。”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甚至校长本人都只能这么说。我们更不必要说：“北大打右派的比例远高于毛泽东规定的5%，显然就违反了中央政策。”因为维权和索赔的正当性源于反右派运动的反动性，而与“比例”有否“超标”毫无关系。

既然反右派运动是反动事件，那么，“右派分子”就不是贬义词。右派分子应当理直气壮地承当这一称号。如果1957年有谁向共产党铮铮建言，那么，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完全不是什么被“错划”。把“右派分子”等同于反党叛国，是当局恶意泼出的一盆脏水。

我们完全有必要将我们因为反右派运动而经历的苦难人生讲给有正义感的人们听，讲给子孙后代听，像《往事微痕》那样写下来千秋永志。通过《往事微痕》，我们不仅要永远记住反右派运动这一劫难，更要永远歌颂和发扬右派分子们独立思考、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精神。

2010年6月1日

政治话语空间左右概念的颠倒

22

周伦佐

国内政治话语空间，左与右的概念颠倒已久。19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中左与右划分造成的视听错乱，好像也是这种颠倒的延续。似有必要澄清。

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考证：左与右这对方向名词引伸为政治名词，始于法国大革命。1789-1791年，法国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分为三派：要求国王具有绝对否决权者，集中坐在右边席位，得“右派”之称。要求废除国王否决权者，集中坐在左边席位，称为“左派”。“右派”意味着保守、守旧，“左派”意味着激进、革新。从此左右成为政治概念，在全世界通行。

这是左右概念的本义。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也是按本来含义使用左右概念的。例如：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为右派，称进步派为左派。称民族资产阶级附合国民党部分为右翼，称支持共产党部分为左翼。依据国际共产主义的通用提法，将共产党内脱离实际而急躁冒进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称为带引号的“左”。带引号的“左”即过左，文革中改称“极左”。毛这个时期对左右概念的使用，大体正确。

可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左右概念之所指便完全颠倒了。

颠倒发生自1957年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右派”概念的错误沿用。

错误的关键是完全忽视了共产党的地位从在野到执政的转变。

中华民国时代，以对待国民党统治者的政治态度为标准，左派与右派的界限比较清楚：凡是反对国民党而倾向激进革新的政治力量，属左派；凡是支持国民党而倾向保守守旧的政治力量，属右派。共产党是最大的在野反对派，国民党是唯一的在朝当权派，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左右划分便以对两者的态度为坐标：凡支持共产党者属左派，反对者属右派；凡支持国民党者为右派，反对者为左派。对所谓“资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划分也是这样：支持共产党主张的称“资产阶级左派”，反对共产党主张的称“资产阶级右派”。

1949年10月1日以后，共产党已经从在野党变为执政党，昔日改变现实秩序的激进倾向，已为今日维护现实秩序的统治立场所取代，以往那种以是否拥护自己来划分党外左派与右派的政治坐标不复成立。因一党专政，没有了反对党，甚至不再有其他社会政治力量，但无论党内还是党外，人们对新体制、新秩序和新政策，依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并持不同的态度。这时的左派与右派划分，自然应以人们对待共产党统治者的政治态度为标准：凡是批评共产党体制而倾向激进革新者为左派，凡是拥护共产党体制而倾向保守守旧者为右派。

大鸣大放中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是激进革新还是保守守旧？当然属于激进革新。以此为标准，他们本是体制内知识分子中的左派。

一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毛泽东，却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他不顾共产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倾向已经根本改变的历史事实，看不到现实中的左派与右派划分标准已经随之改变，否认提意见属于部分知识分子希望极权体制更加适度和社会生活更加进步的善意性激进行为，仍然像过去一样以是否拥护共产党作为划分左与右的标准，仍然将拥护共产党的人称为左派，将反对共产党的人称为右派——并将过去反对者“资产阶级右派”的名称套用在今日异议者的身上。

要求反对官僚主义和扩大民主范围的知识分子，本属今日社会的进步左派，压制并打击知识分子进步要求的政治力量，本属今日社会的保守右派。现在却一下颠倒过来：左派变成了“右派”，右派变成了“左派”，而且被贴上子虚乌有的阶级标签，变成了势不两立的“资产阶级右派”和“无产阶级左派”。

所谓的“反右”运动，就是这样一场左右颠倒的整人惨剧。

这种颠倒，此后长期沿袭，直到文革以及改革之今日。

这种颠倒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请看半个多世纪来的一连串事例。

在官方：

“大跃进”明明形式极左，内容特右，本属形左实右，可是至今仍称为“极左”。

文革初期对待群众问题上，明明刘少奇形右实右，毛泽东却称刘“形左实右”。

林彪倒台后，明明周恩来代表左，毛泽东从形式到内容都代表右，周反批毛派之“极左”，毛反批周派之“极右”。

周逝世后，明明邓小平继续代表左，毛泽东仍然代表右，邓仍批毛派之“极左”，毛仍批邓派之“极右”。

毛泽东逝世后，明明邓小平代表左，“四人帮”代表右，却一直称“四人帮”为“极左”。

.....

在民间：

文革初期，明明“造反派”属左，“保守派”属右，但挨整的前者反被定为“右派”，整人的后者反被称为“左派”。

“二月镇反”中，明明造反派为左，保守派为右，但遭到镇压的造反派反被定为“反革命右派”，参与整人的保守派反被称为“革命左派”。

1976年“四五”运动，明明悼周拥邓批毛者为左，反对者为右，但前者反被定为“反革命右派”，后者反被称作“革命左派”。

1976年“批邓”，明明广大抵制者属左，少数造反者演变为右，但前者反被视为“右倾”，后者反被当作“左派”。

1979年“改革开放”，明明积极拥护者属左，消极抵触者为右，后者却被视为“极左思潮”。

80年代初，人道主义的文化和艺术思潮兴起，明明力主者属左，反对者属右，前者在当时却

被视为“极右思潮”，后者至今仍被看作“极左倾向”。

.....

左右概念明明白白之所指，让毛泽东 1957 年来了个大颠倒，并在官方话语甚至公众话语里沿用至今，将人们对历史事件的正常判断完全搅乱。政治和文化领域 1957 年以来的历史，变成了一个颠倒洞，在里面，因左右颠倒而真伪混淆，让人头晕目眩难以辨别。即使态度激进的政治家和思想者，要想夺路前行，也只能凭着实用理性的机变本能，让颠倒的概念所指服务于自己的是非判断。

例如：官方话语和公共话语至今频频使用的“极左”一词，原指 1967 年中央文革鼓励“揪军内一小撮”的极端倾向和首都“五一六兵团”、湖南“省无联”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极端行为。这本是 1957 年以来左右概念滥用中唯一正确之处。但经周恩来、邓小平在 1972-1975 年间用来泛指文革倾向后，其含义便完全改变——成了毛泽东形左实右路线的代名词。毛路线明明是形式极左而内容特右，但一经官方话语确定为“极左”，人们也只好接受。好在它的贬义所指是否定性对象，于是从官方到学界，人们便根据自己的需要，乐此不疲地将“极左”的瓜皮帽一次次地抛给那些妨碍自己前进脚步的极右势力。

还有官方既反极左又反极右的左右开弓也是这样：借用“极左”代指上层固守毛路线的守旧势力，借用“极右”代指下层追求更多民主与自由权利的革新力量。尽管前者实际是右，后者实际是左，如此借代纯属左右颠倒。但二者都属否定性对象，概念的颠倒并不妨碍大局。

将国内思想界那些顽固的马克思主义信徒称为“左派”并与国际接轨，也属此类混淆。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称为“左派”，因为他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传统，站在体制外的反对派立场，坚持揭露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种种弊端，试图推动社会的变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却相反：他们信仰并捍卫同样的主义，只不过是为了证明极权体制的合理性和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其作用无疑是阻碍体制的进步性改革和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他们明显属于中国思想界典型的“右派”。现在仅仅因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西方称为“左派”，他们也就顺理接轨——同样被称为“左派”。这不是中国思想界眼睁睁的左右颠倒吗？

其实国内外的毛派分子，政治倾向并不相同。国内毛派坚持十分顽固的保守立场，因而属于极右派；海外毛派具有异常极端的激进姿态，因而属于极左派。可见判别左与右的关键，不是只看他们打着什么样的思想旗帜，而是要看他们在各自国家特定的政治倾向。

所以左右概念的颠倒得以延续至今，还和中国知识界的逻辑判断力长期弱化有关。

“整风”、“反右”、“文革”三个运动中民间倾向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定位，长期无人涉及，也有这个原因。

从左与右这对概念的本义来看，“整风”、“反右”中知识分子提意见和文革中民众造反的性质一目了然：他们都属于极权体制内这三个时期民间左派力图改变政治现状的激进行为。

当我从一些文化书籍中看见那些思想激进的国内知识分子自称“右派”、“右翼”、“右倾”之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次在互联网上看见一位名为老威的作家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把 80 年代在四川高校的演讲中以思想激进著称的高尔泰、墨哲兰、冯川、周伦佐称为“右翼演说高手”，立即就有一种左右颠倒的感觉。因为这些人一直很激进、很左翼。可是，这种颠倒至今不仅大量存在于官方文章中，而且还继续流行于知识分子的言论里，令人欲辩无能，只好听之任之。

听之任之者，包括几乎所有公共知识分子。时至今日，我依然看见许多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称“右派”而洋洋自得。

国内学者徐友渔认为：“就总体思想倾向而言，这一代人是向右转了，因为文革暴露了他们以前憧憬的关于‘革命事业’、‘革命斗争’、‘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他举了两个与此有关的例子：其一，几个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的中国学者，发现自己的思想倾向与英国知识分子正相对立。英国教师多持激进的自由主义态度，对保守党的政策加以批判，中国留学生则多支持保守党而不喜欢

工党，他们以过来人的眼光讪笑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其二，有一个多次参加国际政治学会议的中国学者，在与西方同行的交往中有一种明显错位的感觉：来自西方的学者表现出批判资本主义、理解和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而来自中国的学者则相反。惊奇之余这个学者发现原因也很简单：中国人是经历了文革并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前红卫兵，西方人是经历了1968年校园造反，对资本主义弊病仍耿耿于怀的前造反者。这一代中国人对大陆的政治体制和一般方针持怀疑或批评态度。

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是向右转还是向左转？我认为是向左转。区分左与右的标准，应该是一个人在自己国家所持的现实立场和政治态度，而非他信奉的思想理念被人为贴上的倾向性标签。同样的理论体系，既可为这个国家保守守旧的统治集团服务，又可替那个国家激进革新的被统治阶层效劳。当它成为统治者维护现实秩序的思想武器时，原有的尖锐性也会变为掩护保守守旧姿态的盾牌和反对激进革新步伐的长矛；当它成为被统治者改造现实状况的思想旗帜时，原有的温和性也会变为反对保守守旧姿态的长矛和掩护激进革新步伐的盾牌。某种理论体系是左还是右，并没有世界各国通用的标准，关键看它在某个国家是属于主张守成的主流观念，还是属于主张变革的非主流思想。至少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阶层是各种人群中最激进的一翼。其激进体现为希望以文化观念和政治制度的革新或完善来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它总是以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姿势站在统治秩序的对立面，绝不成为统治权力的御用者和应声虫。这在西方国家几乎是通例。中国知识阶层主体部分这一特质的获得，自然归因于文革和造反运动带来的最终觉悟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和极权制度的疏离。他们转而信奉对于中国现状来说更为进步的西方自由理念和民主制度，纯属理所当然。思想观念的这一转变，不仅没有改变他们的激进革新姿态，反而使这种姿态更加凸显。怎么说是向右转呢？

为何许多中国学者到了西方国家会疏远主张“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党？

因为“社会主义”理念不仅在中国曾经造成深重的灾难，而且至今依然是统治者坚持一党专政和阻碍社会变革的护身盔甲。疏离或者反对它，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国家现实的激进革新的左派立场。他们并没有向右转。

为何许多西方学者会倾向主张平等反对异化的“社会主义”？因为在全面自由和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个人无能改变的实际不平等和人性异化以及后现代社会带来的主体碎裂化和精神平面化，仍然是知识阶层面对的严峻现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文化地位及其鲜明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社会改造指向，自然使它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武器。

立足本国现实，双方都属于倾向激进革新的左派，基本立场并没有错位。

不妨设想一种可能的情景：西方式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多元主义文化形态和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终于在中国全面确立并获得巩固。现有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平等未得到有效遏制，日趋疯狂的金钱崇拜、人际欺诈、感官迷醉愈演愈烈，进一步加剧人性异化、道德沦丧、主体碎裂、精神平面的倾斜幅度。那时，激进的知识分子阶层还会继续无条件追随早已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由理念和民主制度吗？这种可能性很小。知识者特有的理性本能和人性良知必将使他们同样用怀疑的目光打量这个新的统治秩序，并对其中暴露的社会弊病发出批判的声音和改造的呼吁。如果那时，马克思主义已被改造为追求社会平等和人性完整的非主流文化，它完全可能重新成为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判的思想武器。至少对于更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并非这个主义有多大的魅力，而是迄今为止人类可利用的思想资源实在太少。

于是产生一个问题：那些重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是否属于再次向左转？当然不是。从现在到未来，他们改换的只是坚持激进革新倾向的思想武器，而非激进革新倾向本身。他们仍然和现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属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左翼，并没有改变前倾的姿势。

把信奉马克思主义作为认定世界各国左派的标志，包含着一个随历史演变而来的认知误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世界各主要国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和激进工人运

动都处于在野地位，他们互相呼应并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资本主义秩序的统治，统称为左派全然成立。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左翼运动虽已夺得政权，但它正与西方民主国家结为抗击法西斯极右势力的左翼联盟，而东方更多国家在野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也正投身抗击法西斯的战斗并伺机夺取政权，此时统称他们为左派，也还勉强说得过去。西方近代以来的民主制度并非一产生就美妙无比。至少在 20 世纪以前的数百年中，它的形象未必不丑恶。对内巧取豪夺，对外恃强凌弱，甚至用武力作后盾以国家的名义疯狂贩卖黑奴和鸦片……那时这个世界上的重大罪恶几乎都是它制造的。想一想中国十九世纪被它用大炮写下的那一册血迹斑斑的耻辱史吧，看一看西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家对它的揭露和抨击吧。当时以激进革新的姿态反对它，未必不是正义和进步。

然而当“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冷战时代已经开始，特别是苏联动用武力镇压了 1956 年匈牙利民主运动和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运动后，西方在野的左翼运动仍然将已经演变成专制、暴力、杀戮、反人道同义词的极权主义政权视为盟友，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种“剧场幻象”。西欧 1968 年的学生造反运动就曾深深迷幻于其中。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和哲学家让·萨特因为一度迷幻于其中而犯下终生难以辩解的错误。但幻象终会破灭。事实上他们随后也与这些政权主动拉开了距离。只是过去的话语习惯继续保持，致使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囿于其中而在划分左与右的问题上失去正常的判断。想不到这种话语习惯通过与国际接轨也影响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

看来，克服这个迷误的最佳途径，还是回到左与右这对地理方位名词引申为政治方位名词时的本义。这个本义其实就是常识。

已故海外学者杨小凯看出左与右的划分隐含着价值判断。为了替文革造反派正名，他指出 1966 年 8 月至 1968 年掀起的工人造反运动、学生造反运动、市民造反运动，与 1969 后毛泽东所推行极左的经济和文化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以至认为民众造反运动的“实质是极右的”，还举例说明：“大部分右派分子文革时都是造反派也显示了造反派运动在反迫害这一点上的极右实质。”

杨先生为了替造反派申张正义，常以饱含激情的文字力排众议，甚至不惜失之偏颇，看得出是个主观性很强的人。没想到在区分左与右的时候也会陷入西方话语习惯的迷阵。其实，除了 1976 年“批邓”时不自觉站到历史进步对立面的少数人外，三年造反运动和造反派的实质是左而非“极右”。只要把实际上倾向造反和同情造反派的“右派”还原其左派的身份，造反派的实质是左还是右也就更加清楚了。常识性的判断被搅得这么复杂！真不知道杨先生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自称为保守守旧的“右派”时，心头是否感到别扭。至少我在替他们感到别扭之时，认为他们都是激进革新的左派。

长期以来，海内外华人知识界关于政治倾向的左与右划分，着眼点主要是西方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分野。

这个左右划分坐标，虽然正确反映了西方国家两种政治倾向的分野，却忽视了国内特情。应该看到，在当前国内语境下，相对于保守守旧的权贵资产阶级，追求自由民主目标的“新左派”和“自由派”共同构成主张革新和改革的进步左派；只有在宪政民主制度确立之后，他们才会分成左派阵营中的两翼。在此之前过于匆忙地将他们划分为左与右，难免搅混真正的左派与右派。

左右概念的对应范围有大有小。大者如全国范围：坚持维护现实政治秩序的权贵资产阶级为右，主张改变现实政治秩序的自由民主力量为左。小而言之，统治阶级内部又有左翼与右翼之分，自由民主力量内部同样有左翼与右翼之分。

知识界左与右的划分，必须放在知识阶层内部或者民主力量内部才有效，否则便会模糊民主力量与反民主势力的对峙，造成政治立场的混淆。

可以认定：

国内的“新左派”，属于知识界左派力量中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模糊左翼；国内的“自由派”，属于知识界左派力量中具有全面西化倾向的温和右翼。

中共内部以李锐、胡绩伟、谢韬为代表的“民主派”，属于主张政治民主化的党内左派；中共内部的“毛派”，属于主张恢复毛泽东路线的党内极右派。

这些年，国内的毛派势力日益嚣张，甚至裹挟了许多希望改变社会现状的下层民众。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相信了自己是主张积极革新的进步左派。如果他们明白自己其实是主张倒退复旧的右派，他们的脸上绝不可能有那么自豪的神色。可见左右概念的颠倒危害之大。

为了消除语言概念中能指与所指的分离，使语言概念获得具体而明确的含义，西方现代语义哲学主张清洗那些充满歧义甚至虚假的现成概念。遗憾的是，不少专攻西方哲学的华人知识分子也缺乏这种学术训练，仍然服从于实用理性本能的驱使而习惯沿用流行概念，在发言中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混乱。

应该清洗被长期颠倒的左右概念了。

忆刘光

高越农

这是我6年前写的纪念文，体现了我当时的感情和认识，所记述的事实是真实的。本文以一个有牵连者的视角，通过党内右派分子刘光展现了1957年清华大学整风反右的一些片段。

我直到近3~4年才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有比较痛彻的反思，这种反思现在仍然在继续着。今年是反右55周年。人们正在打破当局设下的思想桎梏，以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回顾、反思和控诉反右这个反动事件。我借此机会，再次发送我6年前的这篇旧作。

刘光是我清华大学的同学。一年前，她走完了人生路程。因为早已获知癌扩散，我很平静地获知她的辞世。

1999年以来，我与刘光的见面一共不过2~3次。第一次见面是在自九一班毕业40周年欢聚的时候。在孙全康同学精心布置的房间里，我有幸会见阔别40年的同窗，包括文郑麟、武玖玲、刘鸿芝、刘光等同学。当时，“老（儿）童相见不相识”，其乐融融。以后见面，她管我叫小弟弟，我很因这一称呼而感到慰藉。

四十二年前关于刘光的最后印象，是1957年冬某个晚上的那次给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党总支大会。这类的党员大会此前已经开过好多次了，党内职务比她更大的，比如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袁永熙、电机系党总支书记吕森、分团委书记刘卓云等等落马的干部纷纷通过这样的大会而戴帽定论。今晚轮到了她。她的举止神态，现在是一丝也记不得了，反正那晚的主角是她。

我尽量高声地发言，说了一些什么已无印象，只记得当时的情绪：你刘光总嫌我右，其实你比我还要右。

打那以后的四十二年里，刘光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视野内，事实上，我也很少想到她。

四十二年后面，我是有愧疚的，在墙倒众人推的时候，我加力推了一把。

刘光、文郑麟、武玖玲等当年戴帽同学的回归自九一班集体，赋予1999年的这次聚会一种凝重的历史沧桑感。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自九一班是1956年秋季开学时“挂牌”成立的，是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口号后为“两弹一星”培养人才而组建的，是清华大学保密的自动控制系的第一个正式班。26个同学无例外的都是党、团员，分别来自电机系的电机、发电、工企三个专业的“九”字班，约三分之一的同学拿到了清华1955—1956学年学习优良（全5分）奖状。这个班党员共5人：刘光、文郑麟、武玖玲、曹毓慧和我，党小组长就是刘光。在这5个党员中，文郑麟和武玖玲是电自系的政治辅导员，后者还在校团委管事，多才多艺的曹毓慧在校学生会当文娱部长，真正在自九一班“执政”的只有刘光和我，我是团支部书记。

刘光穿着朴素，褪色的黄军装上衣，透露出延安来的气息，她比我们大5~6岁，是班上唯一的正式党员，而且，已有8年党龄。她中等身材，因为瘦而显得高挑，鸭蛋脸，算不上美丽，脸色有些黄，远不如1999年已经成为“抗癌英雄”时那么满面红光。形容略带憔悴，是不是功课方面的压力使然？除了组织生活，我与她几乎不见面。我觉得她的干部气浓于学生气，对于团务、班务，她基本上放任给我。

1956年国际上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在匈牙利出现的由裴多菲俱乐部掀起的自由化风潮，后由苏军平息），国内对于工商业的公有化改造刚刚完成。清华园内思想活跃。

清华各级党委历来重视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组织学习人民日报两论，即《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在我班搞试点。

我们自九一的莘莘学子，个个都有兴我中华舍我其谁的气概，在学习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到为什么党要领导一切，社会主义有没有民主，小到为什么商店服务员变得不爱理睬顾客等等等等。我作为班学习会的主持人，一再强调“三不”（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我深信：通过否定得到的肯定，才是靠得住的肯定。否定之否定是我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学习政治也应当如此。

校团委张慕津副书记和吕森、刘卓云等领导，多次参加我们的班会，他们以听为主，即便说话，也比较温和。他们来旁听，大多数同学都不在意，一样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充分享受着“社会主义民主”。

学习期间，刘光对我并无什么批评，她好像无奈于我的“怪问题”一点也不比非党同学少。她嫌我右的这种感觉来自她的言谈？眼神？我说不清楚，或许来自1957年2月她力主延长我的预备期。

1957年3月一天午后，已经按期转正了的文郑麟约我绕2号楼散步，他与我核对学习会上的一些言论以后，语重心长地提醒说，右的思潮在社会上流行，班上很多人的思想相当右倾，千万要有所提防。

迎来了自九一班的第二个学期，学习生活紧张而有序，专业课开讲了，不少上海来的同学开始阅读原版自控教材，林邦谨开始在数学方面发表论文，我和邦谨还交流学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心得。邦谨说，谁要是能像恩格斯那样深邃地洞察宇宙，还会有什么样的困惑不能化解，什么样的精神桎梏不能挣脱，什么样的人间苦难不能承受？

在这期间，我们党小组的队伍扩大了，同班的李衍达、杨素行同学也成为了预备党员。

1957年五一节，党中央要在全党反对“三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开展整风运动，《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专题社论。

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突然接到通知，让我们党小组集合，一起到北大看大字报，要我们及早防范，以免这种琳琅满目的大字报风潮在清华园内蔓延。党支部交代，不要被大字报里的假象迷惑，要警惕有反动分子在里面趁机发难，必须密切注意所在班级落后分子的动向。

从这以后的1个月里，我和刘光有了更多的接触，我对她有了更新的认识：她主见明确，办事果敢，似乎身体也一下子强健了许多。

她认为现在鸣放的主流是好的。在党中央整风决心的感召下，许多多年来群众不敢讲、不愿讲的话讲出来了，他们与我党的距离不是远了，而是近了。对于改善党群关系，这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好历史契机。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一定会有，不足为怪，不足为惧。

蒋南翔校长在清华礼堂做过一个整风动员报告。刘光主张，在清华园内，我们就得不折不扣地按照南翔同志的意见办，使群众的鸣放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具体地说，第一步就是要在班上表明党小组的态度，真诚欢迎对党提意见，对我们每个党员提意见。

北大来了一个鸣放宣讲团，被早有提防的清华左派堵在体育馆南，最后狼狈地被轰了回去。但

是，挡不住清华大学内部大字报的铺天盖地，挡不住自由论坛下面的熙熙攘攘。

这一时期，对运动我并没有倾注大的精力，蒋南翔在清华大礼堂说了些什么，冯国将同学在明斋自由论坛上怎么讲，校团委书记阮铭抢上台怎么批，我都听刘光的转述。

刘光认为冯国将关于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控诉真切感人，值得同情，她特别愤愤于阮铭的打棍子，阮铭的这种官僚傲慢态度对于群众的大胆鸣放极其有害，阮铭不代表我党，我们党小组必须表明态度。

在阮铭登坛“打棍子”的第二、三天，在2号楼一楼西侧的一间存放着卫生工具的值班室里，刘光召集小组党员开了30分钟的会，一致推举文郑麟于当晚登坛，以“也谈肃反”为主题作一发言。我准时立于稀稀拉拉的听众里，听完了演讲。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完整地听自由论坛。与预想不同，台下听众寥寥，反应平平。这个发言恐怕只起到拯救发言者们自己灵魂的作用。尽管如此，批评者认定，这个演讲是清华园内的第一个代表党组织的叛党宣言。

本小组的党员都是颇有主见的青年，为什么都能够接受刘光的主张？因为她是以理服人的，她常常是动情地说话，什么情？爱党之情。她反复说，清华园内有一股反对鸣放的顽固势力，让他们得逞，后患无穷，长此以往，真是后患无穷哪。回忆她当时的神色，使我不禁想起鲁迅笔下“前额亮晶晶的”柔石。

“事情正在起变化”，全党从上到下都在部署反击。在一次文郑麟、武玖玲有资格参加而蒋南翔缺席的校党委扩大会上，文、武聆听了校党委周维垣等领导的打招呼。【注：按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发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里，早已讲清他对于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对策。“打招呼”实际上渊源与此。】

一天上午，在2号楼学生宿舍，自九一班讨论鸣放形势，会议从空泛议论中开始，约10分钟后，文、武悄然推门而入，他们互为补充地向大家透露了校党委扩大会的内容以及他们的感受：顽固势力完全无视蒋南翔的整风动员，抹黑当前形势，磨刀霍霍要下手了！

自九一班的油锅炸了，个个义愤填膺。在刘光当仁不让的主持下，立即成立了3个行动小组，一个是宣传组，立即将危情周知，一个是请愿组，向蒋校长揭露周维垣等的阳奉阴违，一个是争取张慕津揭发阮铭组。决定：我任第二组组长，刘光任第三组组长。第三组很快碰了钉子，我率领的第二组会后即往工字厅校办，因南翔同志“近日忙”而不了了之。但是，这“反党班会”的罪名已经铸入史册了。批判者说，仅此一会，足证自九一班已经彻底“烂掉”。

使刘光逃不出万劫不复极右分子命运的，还有那张标题为“毛主席的儿媳妇”的大字报。大字报说，按照德智体的标准，这位与她在北师大女附中同学的儿媳妇并不出色，可是却被选送留苏了。这张大字报是在女生宿舍里写好的，有几位女同学也签了名，贴在新斋北面的墙上。在众多大字报里，这张大字报比较孤立和特别，周边既无批评，也无称赞。

今生我没有来得及问她当时的动机。她可能思来想去，一直受党栽培，没有什么意见好提，就把这件事情抖搂出来。敢说敢当，共产党人就应当这样。

在整风运动中，刘光的动力来自哪里？从新中国成立算起，我党已经执政8年了，在党群关系上出现了不少问题，有些群众无辜受到伤害，她感同身受。应该利用这次全党整风的机会，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铺平道路。刘光的动力来自她的“爱”和“傻”，来自乌托邦理想，来自对于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复杂性的缺乏认识，8年党龄并没有给她积累足以应付如此复杂政治局面的驾驭力。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里，在清华大学学生班里，损失最惨重的就数自九一和物八了。我们党小组的刘光、文郑麟、武玖玲、曹毓慧和党外的林邦谨、宋鸿恩都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立即中止了学业（林邦谨犯事犯在撰写了一篇题为“释《还政于民》”的大字报，宋鸿恩的过错在于抄写了这张大字报）。谢贤亚受到团内记过的处分，我也从轻发落，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

1959年毕业典礼是在晚餐后在体育馆前面的大操场举行的。那时，保密专业的“右派分子”均

早已下放劳动锻炼去了，其它专业的“右派分子”仍然得以参加。蒋校长特别给“右派分子”赠言：“奉劝诸位戒骄傲”，“你们为什么犯错误？就是因为太骄傲。”这个赠言，并没有强调立场，没有强调改造，仅仅说了一个“傲”字。我现在以为，对于清华为数众多的“右派分子”而言，最值得他们坚持和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恐怕也是这个“傲”字。

我于1981年前后，在好友士洵的陪伴下，拜会了她的九舅袁永熙。

我此前唯一一次会见袁永熙夫妇是在1954年士洵父亲孙国华教授在北大朗润园的小宅，当时我刚刚考上清华，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

现在，他已经重新工作了，组建了一个新家，住在天安门旁边的南池子。人世沧桑，风采仍旧。

袁永熙说起3年前清华大学落实政策的过程：工作组先对“右派分子”作甄别，在党内、教师和学生里分别找出3个典型：袁永熙、教务长钱伟长（后因故改为孟昭英）以及冯国将，然后再由点及面。在给声名狼藉的“极右分子”冯国将平反时遇到了麻烦，出现针锋相对相持不下的局面。幸好，档案里保存着记录当年冯国将自由论坛上全部“胡说八道”的录音带，再放以后，一致同意予以平反。另外，他还说到，平反以后作为定居印尼的爱国华侨校友的冯国将和母校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整风和反右给刘光的一生，文、武、曹、林、宋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曹和宋20~30年前已作古），这种印记是无法用平反抹去的，是时间流逝无法淡忘的。

一些无辜政治生命的突然陨落，一些才华初露学生学业的嘎然中止，对于清华新成立的自动控制系的发展和党内民主的建设都是一种大的损失。这是伟大中华生命体的无端自残。

能够告慰刘光们的应该是在精神上彻底的平反，应该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盛。这些都需要“与时俱进”，让我们期盼和等待着。

谨以此文祭奠刘光同学。

30

渴望吃肉的日子

陈仁德

当减肥成为最时尚话题的时候，当许多人已经对吃肉感到厌倦的时候，当胆固醇被人们视为致命杀手的时候，我们已经渐渐忘记了——肉食匮乏的时代刚刚离我们而去。

是的，就在并不遥远的“史无前例”时期，我们曾经是多么的渴望吃肉！

渴望吃肉的日子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阴影，当我们回忆起当年那些令人黯然神伤的往事时，仍然感到那些笼罩在历史征程上的阴影是多么的沉重。拂去一层又一层的阴影，我们便清楚地看到了历史苍白的真面目。

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

那时，我们每天高唱着社会主义好，每天感恩戴德地赞美着人民的大救星，每天都说自己过着幸福的生活，而实际上连肉都很难吃上，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肉如同稀有金属一般珍贵，吃肉成为无数中国人的梦想。

1971年冬天，已经插队三年的我，以生产队毛泽东思想辅导员的身份参加了一次在新阳大队（今忠县复兴镇新阳村）举办的全公社农业学大寨学习班。我所在的水坪大队和我一起参会的人员共有20多名，包括每个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和毛泽东思想辅导员。我要说的不是如何在会上斗争阶级敌人，也不是如何在会上强迫那些从未读过书的农民背诵“老三篇”，我说的是，学习班聚餐时，每个到会的人可以吃到一片薄薄的肥肉。

这是一片多么令人垂涎的珍稀无比的肥肉啊，约一寸宽，两寸长，八片肥肉顺着放在一个土碗里，再堆上一些红苕，就成了香喷喷油腻腻的粉蒸肉。开饭时，肉端上桌来了，围着方桌的八条汉子16只眼睛便一齐死死盯着，等着为首的人叫一声：“吊主哦！”便一起伸出筷子（吊主是当年玩扑克的术语，意为打出主牌），转眼间，八片肉便无影无踪了——比猪八戒吃人参果还快。

人们都懂得规矩，知道每人只有一片（炊事员已经精心数过了），谁也不会一次拈两片。

我和水坪9队队长王成生等人同桌，我看到王成生——约40岁的农民，包着白帕子，下巴尖削，把那片热气腾腾的肥肉夹在筷子上轻轻地闪了闪，又凑到鼻子前使劲嗅，却没有喂进嘴里去，他盯着肥肉犹豫了一会儿，就毅然放下筷子，伸手从裤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废纸来，将那片肥肉很小心地放在纸的中间，从四面对折过来包成一个小包，然后放进了裤袋里。

“我么女儿好几个月没有吃肉了，我给她包回去。”王成生用非常平静的语调自言自语说。

我的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感觉像刺进了一根尖利的针，那一刻，我无法吞咽口中的食物。我被震撼了，那是一种铭心刻骨的震撼，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忘却那种针刺一般的疼痛。

王成生身为一队之长况且如此，广大的农民兄弟就可想而知了。王成生用筷子轻轻拈起那片薄薄的肉片的一瞬间，所有关于幸福生活的美丽谎言全部被击得粉碎！

周福良和他的上海妻子

陈懋智

选自陈懋智先生长篇回忆录《浮生杂记》

纤维厂里有一个叫周福良的人，他的遭遇以及他那段凄婉的爱情故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周福良是忠县甘井乡芭蕉园人，年轻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时他是某连连长。在惊心动魄的战斗中，他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身上多处负伤，他脸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伤疤，那就是上海之战给他留下的纪念。占领上海后，他很风光了一阵子，那时一个年轻的解放军连长走在上海的大马路上是非常威风的。

一个上海姑娘爱上了他，他们在上海共结连理，过了一段甜甜蜜蜜的日子。从部队转业后，他带着那位上海姑娘回到了老家忠县，被安排在屠宰场当负责人。那位上海姑娘从繁华大都市来到山区小县城，一点也没有抱怨，还和他恩恩爱爱地过日子。反右风暴来临后，他因为真诚地给党提过一点小小的意见，就成了右派，后来又和我们一起下放到了乡下。

我们这个所谓的纤维厂是用野生滑扣树的树皮来加工纤维，当地农民把滑扣皮卖到新生供销社，供销社再把滑扣皮交给我们加工。每当供销社收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我们就会派人去新生场把成捆的滑扣皮运回来。周福良就是负责去新生场运滑扣皮的人之一。时间长了，供销社的收购员都认识他，虽然不知道名字，却认得他脸上的伤疤。

这一天，周福良在去新生场的山路上见到不知是谁洒落在地的少许滑扣皮，就弯腰拣了起来，握在手里有一把。到了供销社，他不假思索地就将那把滑扣皮卖给了收购员，大约一斤，得了一角多钱。

周福良要是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拣这一点滑扣皮的。

那位收购员原来是个阶级斗争觉悟很高的人，随后他就向李明忠反映，说有一个脸上有伤疤的右派分子来卖了一斤滑扣皮，一定是从厂里偷来的。生性暴戾的李明忠哪听得这种事，立马就小题大做添油加醋，说周福良右派分子不思改造，将厂里的原材料偷出去卖。一阵臭骂后，竟以盗窃国家财产罪上报法院，而堂堂的法院竟也据此将周福良判刑七年投入大牢。

周福良入狱后，他那位年轻的上海妻子在忠县无法生存，便抱着不满半岁的孩子悲伤地回到了上海。

可怜周福良这个为共产党打天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伤痕犹存的老战士，竟为几片树皮搞得银铛下狱妻离子散毁了一生！

后来看电影《战上海》，当银幕上出现解放军冒着密集的炮火奋勇前进，一些战士受伤倒下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周福良，他就是战上海的英雄呢。

二十年风风雨雨转瞬即过。1978年的一天，我行走在忠县街头，忽然听见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在喊我的名字，我循声望去，看见一个满脸皱纹的农民在向我微笑，那一瞬间，我看到了那人脸上的伤疤，“周福良！”我大声叫着向他走去，眼眶在不知不觉间就湿润了。

我握住了周福良的双手，那是一双非常粗糙的布满老茧的手，这么多年来，这双手不知受了多少苦啊！

周福良似乎很平静，经过二十年的折磨，他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激情与风采。他对我说，七年期满后，他的户口下到咸隆乡，从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由于他是右派分子加盗窃罪的双料敌人，他在乡下继续受到非常严厉的管制，生活十分困难，其中的痛苦难以言喻。妻子带着不满半岁的儿子回上海后就失去了联系，连生死存亡都不知道，他也就慢慢死了那条心，在乡下找个农妇结了婚，已经有了孩子。

望着周福良脸上的伤疤，又想起他当年出生入死冲锋陷阵的场面，不禁为之唏嘘。

又过了三年，我去石宝寨参加一项文化活动，在风景秀丽的石宝寨下，我又见到了周福良，这次他还算穿戴得整洁，气色也好了些。一见面他就急匆匆地告诉我，他已经平反了，安排在石宝食品站工作。说到当年含冤下狱，他愤愤地说：“都是李明忠整的呀，这个人心肝都是烂完了的，我被他害得惨啊！”

周福良忽然问我：“还记得我那位上海妻子吗？”

我说：“怎么会不记得呢，很贤淑的一位上海姑娘啊。”

周福良接下来的话让我大为惊叹，感动不已，几乎不能置信。

原来，那位上海姑娘回到上海后发誓终身不嫁，要一直等着周福良，其间写了无数封信到忠县，都被退回。由于她外语很好，被安排一家中学当外语老师。她和幼小的儿子相依为命，受尽了想不到的艰难困苦。曾经有许多人劝她改嫁，也有不少人追求她，都被她婉言相拒，她抱定自己的信念，要等着周福良团圆。儿子因为周福良的罪人身份出不了头，被迫改了名字，跟外公姓肖。现在儿子已经在杭州当工人了。文革浩劫后，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她相信周福良是无罪的，一定会平反，就写信到忠县有关部门打听，就这样，在中断二十多年联系后，终于和周福良联系上了，也是在这时，她才知道独守空房等待了半辈子的夫君早已经另安了家。

周福良说着，从身上掏出了一大叠信来，原来都是那位上海妻子写来的，信上反复问，“你现在的妻子好吗？对你关心吗？”还说，当时不到半岁的儿子根本不知道父亲的模样，她要带着儿子来忠县寻父，让父子团圆。

听到这里我大大的感动了，真不相信世界上真有如此痴情的女子。

周福良又掏出一叠稿笺来，竟是那位上海妻子二十多年里连续不断写下的思念丈夫的情诗，其中不少是用外语写的。我随手翻了一下，无不情深意挚令人断肠。

如此凄婉的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恐怕连传奇小说里的那些故事也会为之黯然失色，谁能相信这一切竟然都真正发生了，而且就在我眼前？我不禁对那位品德高尚贤良钟情的上海女子充满由衷的敬意。

“我对不起她……”周福良捧着那一叠仿佛有些烫手的诗笺像是对我，又像是对自己说。

可是，到底是谁对不起谁？是谁丧尽天良制造了这一桩桩人间悲剧呢？

三个没有“改正”的右派大学生

陶渭熊

《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载胡治安《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改正》一文中说，林希翎是未得改正的寥寥数人中“唯一的学生右派”。在此前的一些文章中也有这种说法。其实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据我所知，没有改正的右派学生除林希翎外，至少还有冯元春和曾清经两人，只不过他们的知名度没有林希翎高，不为大家注意。本文试图对这三个没有改正的右派学生作一简单介绍。

林希翎

林希翎（1934—2009），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是1957年毛泽东钦定的右派大学生。其知名度极高，她的“右派言论”及后来的经历，是研究反右运动这段特殊历史的重要史料，“林希翎”三个字已经成为这段中国现代史的代名词之一，早为大家知悉，这里从略。关于她为什么没有获得改正的原因，原来知道一些，但不十分详尽，特别是高层对于林希翎问题的争论，更不为一般人所知。在胡治安的文章中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如有兴趣可以阅读。大体说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总书记胡耀邦和一些老干部是主张给林希翎改正的。但她最终没有被改正，其原因，一是人民大学负责右派改正工作的经办人，正是当年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对林希翎有很深的历史成见，他向中组部写的报告，“不仅对林57年的言论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而且对其现实表现也尽力夸大任意指责，把林希翎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甚至是骗子、流氓、恶棍”；二是负责右派改正工作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因中宣部人员对林希翎的过分热情，触犯了杨的尊严，他要叫劲与有关部门比试权威”，对于林希翎的问题“又没有调查研究，偏听偏信”，根据上述报告“一锤定音”，说：“右派改正要实事求是，不改正也是实事求是，林希翎人头不大，影响很坏，不改正也是实事求是。”由此，林希翎就只能成为证明反右斗争“正确性”和“必要性”的标本了。

从林希翎的一生，可以看见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对一个弱小女学生的残酷迫害；从林希翎的“不予改正”，可以知道官僚主义和极左老爷们对于一个饱经迫害的女人的继续践踏。

冯元春

冯元春（1928—1970），女，四川青神县人，四川大学生物系57级学生。57年鸣放时她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讲演的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三大主义武装的最巧妙、最残酷的剥削集团》，因此被定为极右派、反革命分子，判刑13年。她在监狱中的遭遇现在还没有文章报道，只听说她拒不认罪。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冯元春说：“我说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和刘邦、朱元璋一样，夺权后就杀功臣，这就是证明。”她的话被人告发，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当局以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攻击伟大领袖，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等罪名枪毙于南充市。1980年改正右派时，四川省有26名右派“不予改正”，其中第一名就是冯元春。

和林希翎比起来，冯元春的知名度不高。最先介绍冯元春的是谢泳先生《1957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一文，后来铁流、曾伯炎等57难友也有回忆文章，但搜集到的系统材料不多。从上述作者的文章中我们大致知道冯元春的一些主要言论和思想。

她是最早公开批判毛泽东的人。她认为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她说：“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全是毛泽东的杜撰和引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的统治阶级组成的政府，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他们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力，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通过的《宪法》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

对于共产党，她说：“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再无存粮，今后要是发生一点灾害便会饿死人。”她还说：“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的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她举例说：“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以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宣传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而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冯元春还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提出了意见，她说：“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

冯元春还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高饶事件。她认为，根据已发表的材料，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冯元春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还会是什么？”冯元春的观点是，高饶没有反人民，他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泽东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因此毛是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冯元春认为，毛泽东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二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冯元春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上书二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她还说：“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冯元春能道出历史的真相，不仅要有勇气、骨气，尤其要有准确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思考能力。冯元春是反对现代专制制度的最早启蒙者和勇士。

曾清经

曾清经（1928——1961），男，四川省遂宁人，西南师范学院（现在的西南大学）化学系58级学生，1957年大鸣大放时划为右派分子，受二类处分——保留学籍劳动察看，于1958年4月送重庆北碚金刚乡劳动改造，9月底回西师生产部右派学生劳动队继续劳动改造。因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彻底破产，全国全民一片饥荒，学校也不例外，而右派劳动队的劳动任务又重，身体消耗得不到补充，个个饥饿浮肿但还要继续劳动。后来西师在北碚城外30里的西山坪办了一个农场，右派劳动队成为农场的主力。那里的劳动极其艰苦而生活更加恶劣，每个人都饿得来皮包骨头，游离在饥饿浮肿与饿殍之间。1961年6月，曾清经在一次运输货物的路上实在走不动了躺在路边休息一会，竟再也没有站起来！3个月后西师右派劳动队解散，大家都摘帽复学，曾清经也被摘帽，但他早已是荒山野岭中的一个孤魂。后来右派改正时他却没有被改正，成为西师700多名右派学生中唯一没人改正的人。

比起前面两位学生来，曾清经没有丝毫名气，除了笔者在《难忘几位右派难友》、《悼念林希翎，说明一件事》中提到他之外，几乎不为外人所知。但他的右派言论却以重要内容保留在《西南师范学院资产阶级反动右派言论集》第一辑和《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一集中。两份材料基本相同，都是根据曾清经《鸣放发言全文记录》整理而成的。而曾清经被当时全校所知，是缘于一张《曾清经要杀共产党》的大字报。但在上述两份材料中却没有这一骇人听闻的记载，可见该大字报纯系栽赃陷害。在上述两份材料中。曾清经的主要言论有：

一、国民党是革命党。他说：“孙中山的革命是正确的，他的理论是现实的，他创立的国民党

——革命政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民主党之一，不是反动党，孙中山的思想不是反动思想，他的大同思想老实说社会主义实现也不能包括其全部。”“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在台湾存在着……我建议国党由台移北京，人员全回国。由共（产）党发动群众或与群众一道欢迎回来，承认国（民）党政治上进步、民主，恢复大陆组织，让信仰三民主义者有组织，不蔑视为反动党派，让其站到中国人民中应有的地位，监督共产党，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说共产党振（整）什么风，是在宣扬一党独揽大政的功劳。我认为国（民）党上陆，两党竞争，则一些（共产）党员，自不腐败矣。”

二、土改问题。他说：“我不反对土改，而是赞成的。可是问题多了，土改不容协商，地主阶级帽子扣上，政治经济地位没有了，行动困难，信仰（威信）扫地，营生困难。”他还说共产党带来“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所以“我赞成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政治平等，经济上也平等。”

三、党委制退出学校。他说：“党委退出学校，学校是文化、科学、教育机关。不是党校，不是政府，不是军队。学校是以教师为中心……老师不能领导学校，几年来学校搞不好，学风没有，师生感情没有，教师成了教书不教人，知识授予也有限。”

四、共产党的毛病太大。他说：“马列主义……就是一个思想，一个党，以党代政。”“我认为党的毛病太大了，深不可救药了，以另外的党派为核心亦可。我认为这样做真可谓马列主义的再发展，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实际运用，可谓之大发展一步。”“事物是发展的，共产党在变，小资产阶级也在变。如果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比共产党好，就可以让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执政。”“共产党如果还有莫大生命力的话，公民还有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权的话，我想还是百家争鸣好，铁幕拆开好。”

五、马列主义唯物论不是绝对真理。他说：“宣传马列主义也应宣传其他主义，如三民主义，让人们思想活跃，让群众开开眼界，不再盲目。”“至于批判马克思，推翻马列主义，说它不是真理，也应该看他批判得有无道理。我觉得马列主义治国平天下可以，作为信念可以。但是不容怀疑，一个科学定律有其范围、局限性，它几乎代替了每一个人的人生观，用这种人生观处理一切生活大事，往往又出问题，就是不近人情。”“我建议人们大胆思想，马列主义唯物论是不是绝对真理？唯心论，资产阶级思想全坏吗？”

曾清经还有其他一些观点，例如“党团颓废了应让青年成立党派”，“共产党拿三大主义害人”，“民主党派不应该是共产党的化身”等。

曾清经的言论涉及面较广，但总体上没有超出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言词也比较平和，论述虽不十分深刻，但所揭示的社会现象却广泛存在，并无“攻击诬蔑”；而且两份材料都是勒令曾清经交出的发言稿中的内容，“其中有些还未发表”（西师“右派言论”第一辑），以这样的材料定罪是典型的“思想犯罪”。我想如果曾清经还在世，对于他的“不予改正”一定会提出上诉的。

2012年3月

我所认识的几个“右派分子”

何青山

1957年秋，我考入成都列五中学高中部开始学俄语。俄语老师叫黄鼐，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头，穿一身蓝色中山装。面部白晰而略显忧郁憔悴。不久，学校传出消息，说黄鼐老师在川师当学生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以后学校调来一位北师大俄语系毕业生代替了黄鼐老师。从此我们看见黄鼐老师每天挑着粪桶，扛着锄头在校园后面那一片蔬菜地里挥汗劳动。

1960年我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62年秋，班上来了两个从北碚西山坪劳改农场下山来复学的同学，他们都是所谓“摘右派分子”。那位女生陶某长得眉清目秀，据说是当年的一朵“校花”，还是中文系的学生干部。57年反右时，西师清查学生行踪时，盘问学生：有谁经过学生鸣放场所？她如实报告说她经过了，于是被打成右派。后来她被弄去北碚西山坪劳改三年后“摘帽”复学到我班。而那男生姓魏，1952年曾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负伤后复员。他54年考入西师中文系，57年响应组织号召参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弄去劳改，三年后“摘帽”复学到我班成为我的同窗室友。

当然，戴帽右派、摘帽右派，其实都是右派，都属于“黑五类”，都是“牛鬼蛇神”。所以，老魏毕业实习时，因上文天祥《过零丁洋》一诗讲得动情，遂被诬之为借古讽今，停止他实习，不予毕业分配，并派干部押送他回老家西充。老魏踏上故乡土地后，深感“无颜见江东父老”，遂应先去新疆闯荡的右派同学之约，只身去了新疆。他在新疆当过修理工，为人修过房子、修过桥梁，放过牛羊，挨过冻饿，睡过坟茔，成为大学生天山“牧马人”，直到78年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后回到西充老家结婚生子，以南充教育学院文艺理论副教授身份退休。然而，因经年沉疴，病魔缠身，几近不能下楼。最近我去电子邮件通知他参加我们年级的奉节同学会，老魏答曰：

“时代伤造成沉疴，目前需挂氧而延命，旅游已成今生奢望，可意享而不能体受。遥祝师兄弟姐妹趁此健康时刻，赏阅江山需尽欢：虽然漫山黄叶仍然萧萧下，已非长江滚滚来。而今白帝成孤岛，谁能预测何时又变样。”

老魏1933年生，而今已近八旬。联想他的经历，读此邮件能不怅然而涕下？

1966年文革中，我单位首先揪出的“活老虎”是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群众对他们天天进行斗争。同时陪斗的有所谓“死老虎”即单位的地富反坏右（包括国民党时期的残渣余孽）等“牛鬼蛇神”。右派分子中有曾经的领导、教师和刚从西师、川外分来的调干生等等。其中，西师64级物理系调干生吴太鸿，解放前是长航“重庆”号轮船上的青年工程师，在该轮起义时协助地下党曾立下汗马功劳。后以调干身份考入西师物理系，在57年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弄到西山坪劳改。“摘帽”后复学到物理系，后分到单位又遇文革而被再次揪出来。1966年冬，因在单位被监督劳动，而回家又受冷遇，终于在内外交困中被迫“自杀”了。死后还被毫无人性地声讨为“畏罪自杀”！

另外一位同事，是川外调干生，读川外前是西南服务团的战士，他被川外打成右派后历经坎坷，终于熬到了78年得以平反解放。但已被弄得死去活来，身心疲惫，垂垂老矣。

我单位还有两个“右”字号人物，就住在我们单身宿舍隔壁，一位姓王，解放初是驻市教育局军代表，57年被打成右派后就被监督劳动，尝尽人间炎凉。78年“平反、解放”后被任命为市教育学院总务处长，却因长期被打入“另类”而失去领导能力，没几天也就离休了。

而另一位姓胡，解放前是川东地下党人，解放后是局级干部，被打成右倾分子而长期被“挂起来”。78年“平反解放”后，他申请到政法学院教书去了。

在那悲惨年代中，几十万右派分子、无以数计的内外控管的右倾分子及其家人的悲惨遭遇，加上那时人祸为主而造成的大饥荒，构成了中国大地人人自危的悲惨世界，其深远的灾难影响至今犹在，没法磨灭。……

迟到的吊唁

——重返长寿湖*

它 山

*距重庆 100 余公里外，面积方圆 245 平方公里，内蓄 200 余小岛的长寿湖，1958 年起把市级党政机关系统的七八百“右派分子”和一百多“历史反革命分子”遣送到此劳动改造，22 年中，折磨至死不少。

觅踪

又踏上
这片活埋过青春的土地
寻找敲得响的骨头
咀嚼风干了的记忆

为了未来的回响里
应有一声正义的叹息
纵然今日迟到了
历史决不允许明天的缺席

红湾——起点

它的本名叫黑湾
不知是谁给它
抹上了一层血染的风采

这里是把你点交给
人间炼狱的起点站
是叫你脱胎换骨
当牛做马变鬼的开头
去吧
大湖会给你一个
死去活来的自由

抓起一把泥沙
捏出的是血
是泪……
是亲人望穿秋水
二十二年孤灯下的
苦守
是寻找尸骨无功而返的
儿女们
跺着脚呼喊你在哪里的
声声哀求

码头

说不上叫码头
这座水上监狱
堪称“得意的杰作”

浑然如坟的孤岛
唯有这个停靠的缺口
牢门洞开

一片汪洋，何来方舟

冷对苍穹四野
心里在低吟
老一辈囚徒们唱过的歌*
寻找一个活着的理由

*重庆歌乐山烈士《囚歌》：“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余婆婆

——早年毕业于北师大，大家叫她余婆婆。伴随儿子劳役 22 年

看见她	一路爬山涉水崎岖坎坷
背包拎伞	
迈着跨世纪的小脚	天上有个圣母
踉跄趑趄跟上儿子……	地上有位妈妈
踏遍荒山、大湖	在这人间地狱里
风里雨里紧随儿子	面对苦难，鄙视邪恶

石头

——亡友之女寻找父亲遗骨，拣回一块并不起眼的石头，告诉我

老队长领我	只有我
爬上一壁石岩	滴血的一双手
他拾起一块石头	
抛向大湖	面对大湖
划出一道半圆的弧	点燃香蜡纸烛
坠落在岸边滩头	一遍又一遍
他说就在那里	呼喊着
就是那里啊	爸爸的名字
	我紧握
我刨遍滩土	这块坠落的石头
把块块乱石翻透	请回家来
不见一丝半点	让思念
父亲的尸骨	化作永恒的石头

歪脖子树

——营地后山，一棵生长在悬岩朝向大湖的树

远远望见	还是那样挺拔
怦然心颤	孤独地伸出手臂
那棵	执着地叩问苍天
歪脖子树的身姿	横空飞出

一只乌鸦
惊起了一丝苦笑

你是天堂的指路碑
还是地狱里的十字架

总让人思念
那些不甘其辱
挥手而去的勇士
向着天堂寻求自由

倘若

人头山*前
船后，泛起一串串白沫

倘若他还活着
世界上还会有一个“拉登”
呼风唤雨在井冈山谷

倘若他还活着
一个战争疯子会押上数亿
人民的身家性命挑衅地球

倘若他还活着
历史将拷贝出一个
人人喊打的“卡扎菲”从狗洞爬出

倘若他还活着
今日的湖光山色里
我只是一堆含恨无语的白骨

倘若，历史没有倘若
船后，翻滚起一路泡影绰绰

*人头山是耸立长寿湖中最高的山头，这里湖面最宽水最深，是风浪最大的高危地区

39

回首

蓦然回首
一座座
昔日的孤岛荒山
如今如此郁郁葱葱

那是血与泪
滋养出的精魂
是 57 苦难的提炼
是含恨而终的亡灵

是“阳谋”塑造出的
一座座血肉丰碑

不啊，那是
历史的正义
给暴君打上了，
遗臭万年的
一颗颗耻辱的铆钉

凭吊

长寿湖
一个幽默而揪心的名字
让人哽咽
令人哑然

湖光山色中的
冤魂
凄风苦雨里的
白骨
至今仍在

默默期待
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个
日夜里
总是
等不来一声
正义的道歉

仍在招摇
幽灵还在
四处流蹿
我只能
低下沉重的头颅
留下
一个凝固的无奈

举起的僵尸

2007 初稿 2012 为反右 55 周年祭改定

下图为第 15 页《当年罪名——解读当年开除孙铭勋党籍的组织决定》一文所附当年的剪报。

